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7月31日第16期

总第162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ROUNDTABLE | UNIVERSITY OF COLOGNE

GLOBAL SOUTH STUDIES CENTER COLOGNE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LOGNE

ORGANIZED BY
Global South Studies Center
Prof. Felix Wemheuer

VENUE
University of Cologne
Seminargebäude (100, Raum 26,
Universitätsstraße 37
50931 Cologne

CONTACT
felix.wemheuer@uni-koeln.de
(no registration necess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URTHER INFORMATION
gssc.uni-koeln.de

April 22, 2016, 19.00-21.30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Legacies and Continuities
文革五十周年

Speakers: Andrew Walder (Stanford University), Barbara Mittler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and Chinese scholars

《记忆》162期

科隆会议专辑

目录

【专稿】

沈迈克 国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2016年夏季的形势

——科隆大学“纪念文革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科隆之会】

何蜀 他们为什么成为造反派——重庆造反派百人分析

秦晖 血腥之夏：从“七·三”到“七·二七”——广西与北京造反派的覆灭

【随笔】

阿陀 印象科隆————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德国之声】

专题报道 文革五十年：斗争还在继续

专访 德国汉学家文浩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西方的新左派

德国汉学家魏格林回忆文革中的北大

【简讯】

韦陀 德国科隆大学召开“纪念文革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资料】

友珏 德国科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简况

【读者来信】

1. 皮皮侠答乔晞华 2. (德) 魏大卫谈会员制 3. 蔡鸣乔纠错

【本刊声明】

【专稿】

作者简介



Michael Schoenhals (沈迈克) (1953 -), 瑞典隆德大学 (Lund University) 语言与文学中心教授、瑞典皇家人文科学会 (隆德) 委员。1972 至 1975 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学习, 1975 年赴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1987 年获得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后赴北美, 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洲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加拿大比卑诗大学亚洲研究所等任博士后、客座研究员。1992 年回瑞典, 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97 年任瑞典隆德大学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2003 年转入语言与文学中心从事研究与教学, 2007 年任正教授。主要著作有 *Saltationist Socialism: Mao Zedong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 (跃进式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与 1958 年的大跃进) (1987)、*Doing Things with Words in Chinese Politics: Five Studies* (中国政治中的提法问题) (1992)、*Mao's Last Revolution*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与麦克法夸尔合著) (2006)、*Spying for the People: Mao's Secret Agents, 1949-1967* (用间为民: 毛泽东的秘密特情, 1949-1967 年) (2013) 等。

国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2016 年夏季的形势¹

德国科隆大学 2016 年 4 月 22 日—24 日举办的

“中国文化大革命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Michael Schoenhals (沈迈克) [瑞典]

¹ 本文系原演讲的修订稿。



每人都会有一个与别人意义不同的文革——脑子里的，肚子上的，书架上的，嘴上说的，心里想的。二十多年前，中国的一位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轰动神州学界的新观点，说文革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个！一个是上层的，一个是下层的。还说前者是权力斗争，后者是“群众利用‘文革’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我觉得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中国

（沈迈克科隆会议讲演，阿陀摄影）古人曰：“道生一，一生二”。毛泽东洞察一切，得出的也是类似的结论，即“一分为二，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后来有个陕西人，中国作家协会的，提出异议，在中央党校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一分为三》。不过，他所讲的不是文革，而是法治建设。

我认为文革不光有一个，也不光有两个，而是有上万个。在这里“万”是“极言其多”。就跟中国古文里的数字“三”、“六”、“九”一样，是虚指。不是一千的十倍的那个实实在在的一万。无论是“一生二”的“生”也好，还是“一分为二”的“分”也好，都是代表一条思路，而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的时候，你不能光迈出两三步来，然后停下来开始想别的。“多思”的时候，你一定要大胆，一定要“完全彻底”。还是古人说得好，“三生三，三生万物”嘛！

鉴于发言时间有限这个硬道理，我不打算总评一万个文革，也不想对近几年出笼的所有的新的研究成果妄加褒贬。在座的同仁都是喜欢读书评的，并且是经常给出版社和期刊审读未定学术稿件的，也就是说，大家都掌握了最新的动态，尤其是在座的几位办网站和电子刊物的——你们这方面的贡献特别大。十年前，我们在密云开文革四十周年研讨会的时候，还没有你们今天提供的这种平台，当时要想交流经验、交换信息、百家争鸣，哪里象后来这么方便！有了《记忆》、《昨天》等平台，我们大家基本上自己能够掌握“谁在做

什么，做得怎样？”。人人心里有数，用不着我在这里逐个去“妄议”！

少数人——专家研究的文革与多数普通人的文革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重大区别。普通人，比如张三李四的文革是默默无闻，自生自灭的；除了亲友子女以外，没人知道。你我可就不同喽！教授和博士的大作不管写得怎么样，总会有人看。可不能小看了这个影响力！今天在座的所谓“学术权威”无疑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为了一个共同的学术目标，被请到德国来的。这种跨国的影响力还小吗？

不过，你说怪不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到底影响了哪些人？怎么影响的？谁都说不清，道不明。中国人论“言”有个说法，只要知识分子能够把握好所谓“正”的（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林彪称之为“科学的”）见解、主张、意见等，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影响、甚至去支配“言”的社会效应。毛泽东在1963年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一言可兴邦，还说赫鲁晓夫反其道而行之“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不过，实践证明，问题没那么简单。

这里有人可能会说，我在混淆两个范畴之间的界限，在掩盖一个学术和政治的截然不同。其实不是。文革研究从来就不是在象牙塔中进行的，哈佛大学位于美国麻州而并非世外桃源。我们各国大大小小的从事政治研究的人并不是“不读书、不看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说“史学家这个职业是为他人宣传及制造神话提供素材”。不错，我想今天出席这个研讨会的都或多或少见证了。就拿我和马若德写的那本《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来说吧，从2006年出版至今十年，经过各种人引用变成了顶级的宣传和神话素材。原来中国共产党有十年文革的全盘否定论，但内销转出口的结果是论点没人引。后来欧美学术界一老一少联合起来否定了十年文革，那就是（电视剧里常说的）“我的 my God!”啦，看的人多，引用的人不少。今天让我借用《人民日报》的反右语言去提问，“这是为什么？”根本原因不在作者这一边，而在读者那边，包括广大记者、政客及智库等。

文革研究在2016年夏季的形势究竟如何呢？羌胡夷狄情况略微不同，德文书市、法文书市、“弱小国家”的书市都各带其民族特色。不过，据我观察，概而言之，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不是六、七十年代七、八亿中国人怎样生活的史书，而是让他们深深地感觉到“还

是今天这个时代好”的“中国 X 贼罪恶史”。人们寻找的是一种心理平衡，一种安全感，是一种让自己觉得，今天的处境，哪怕不理想或不完美，也比生活在毛泽东晚年的共产主义中国，幸福不知多少倍！总之，人们需要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忆苦思甜”。

在许多读者看来，我们的研究成了对中国“十年浩劫”的研究，而并不是对六、七十年代的国史的全面调研、剖析和思考。熟悉中国文艺理论的都知道“主题先行”、“根本任务论”。你以为这些东西早在历史的垃圾堆上长了毛儿。其实不然。挪个地方，擦擦干净，又用上了。只不过今天的使用者不知道它们的史前史——这些理论因为曾经是所谓“四人帮”的最爱而惨遭批判。史学权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还有一个说法，我很喜欢，那就是历史学家“在我们的领域里所播的种子，说不定将会变成一种人民的鸦片”。老人家很有预见。如今有不少文革研究成果，要么成了人民的鸦片，要么成了“宣传及神话的素材”。

我这样说，似乎是检讨，但不全是；反过来，非要说是恶毒攻击嘛，也不是，因为炮打的目标毕竟也包括我本人。不管怎么说，我的这些说法，没有几位历史学家爱听。在1969年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他不赞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的口号。但我们史学界还是认可这两种劳动的。研究做了，书写出来了，至于别人如何引用当作“宣传”和“神话”素材却是作者本人无法控制的。

那么，我刚才说的，具有人民鸦片作用的文革研究成果是什么呢？在欧美，首先是让读者经常深深感觉到文革的“三个独有”：所发生的一切是中国独有的、中国人独有的、共产主义独有的。在他们看来，凡发生的事情，都得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如果某本著作还有一个什么“深层结构”的话，那么作者最好标明所有看得到，听得见，摸得着的文革现象统统都是（一）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意识在起作用的，或者（二）“共产主义”制度下产生的怪物。

此类文革研究说明文革的确有历史意义，但除了对中国人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以外，没有现实意义。此类学术著作，翻翻看何等舒服，放下来以后可感到毕竟进步了，文革的一切都是大半辈子以前的“特殊条件下的特殊革命的政治”！有多少文革研究的成果，

它的客观效果（我刚才已经提到的，与作者的意图不是一回事）不就都在说明这一点吗？
阿弥陀佛！

有些文革研究成果经过媒体放大是不难成为“宣传及神话的素材”的。比如说名牌大学的权威在媒体上发表的不到一千字的“时评”。网上有不少颇有影响的机构，在此仅以“亚洲协会”为例。这个协会是美国石油工业家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三世于1956年创办的，它自称是为了“在全球范围之内，促进亚洲与美国的民众、领导、机构等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伙伴关系”而存在的一个组织。（注：它与1954年由美国中情局筹办扶持和暗中资助的《亚洲基金会》不是一回事）这个协会的网站上有叫“中参馆”的平台，是各国学者和专家进行简短的“对话”的虚拟空间，所发表的言论每一次都围绕着一个由其主办人提出的“本周主题”，紧扣当前政治。

今年四月初，“中参馆”的主办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五十年以后，文化革命的影响还会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吗？”不少大家熟悉的名人就此发表评论。有人说：“‘文革’就是搞民粹主义的可怕试验。”也有人称，“在所谓的‘文革’中有一亿无辜中国人遭到私刑杀害的恐怖袭击。”还有人指出：“最近提倡对智库和学术界进行一次意识形态大清洗的言论，既可怕又让人们想到‘文革’。”总之，这里充分实行了“双百”方针。

主要媒体的“人物专访”也是让学者参与推广“宣传及神话”的活动。我不愿意接受这类专访的原因是这种采访不象《记忆》杂志那样，可以就学术问题进行自由探讨；也不是在课堂上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

有关辞书对“专访”的定义说得好，对你的这种专访是“记者带着目的对有关人士进行专门的采访”，是一种“以特别强调的方式获取详细而生动的独家新闻的手段”。妙就妙在“带着目的”四个字，因为这个目的是人家掌握的，不是你掌握的。你一旦没“说不”就等于同意进行一次交易，人家给你扬一下大名吧，你就开始按照他的热点提纲去玩儿“专家指出”，“教授说”等游戏。

也许你会问，这个记者为什么不看你的书？他才不呢！他要的是独家新闻，就是说要

你现在用一句话回答他提纲中的每一个问题，诸如：“当前在中国，他们怎么看‘文革’？”“官方怎么看？”“民众到底怎么看？”“听说过XXX认为1949年以后的整个时期都要当成一个整体而看待：他这个看法怎么解释文化革命的结束和开放的起点之间的转折？”“不管人们怎么看它，‘文革’留下的实际遗产是什么？”“它的影响，比如说在教育界，还能感觉得到吗？”“对党员来讲，是不是大失所望？”“可以不可说有‘迷惘的一代’？”“历史学家们，特别是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因为接触了那么多新的材料，是怎样改变了对‘文革’的看法？”等等。以上几个问题，都是本月初发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记者。这些问题颇具有代表性。

文革全称为“文化大革命”。这是当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造出来的新词儿。那么，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到底发生过一场文化大革命没有？掉头仔细地看一下，你就会发现根本没有！中国文化的大革命是后来的，其高潮至今恐怕尚未达到巅峰。在世界史上，恐怕没有一个词，比文革更“名不副实”了。在中国史上，要说革文化的命，今年已经五十周岁的文革只能算是小小巫。真正的“大巫”，是当今还健壮无情的“现代化”！当年老三届用毛笔写大字报，如今九零后用电脑写帖子“提笔忘字”！哪一个算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不说，你们懂。

今天文革所指的，是对半个世纪前的若干年当中，在中国大地上先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一小部分。正如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1994年在《隐喻的兴亡史》的论文集里阐明的一样，“冷战”这个名字所指的不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对部分历史的某种叙述性解释。

你也许会说没关系，一个“符号”与其所指的东西，未必是一回事。你我也好，毛泽东也好，起名都是允许带有一点“随意性”！哲学家关锋先生，在座的一定很熟悉吧？他在论《老子》时，这么说过：“‘道’还是要说的，名字还是必须起的。那怎么办呢？只好勉强地给它起个名字，勉强地用普通语言来讲说它。……此类名字都是‘强为之名’。”

当年毛泽东，以他的需要为出发，造出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强为之名”。“写”历史的人，半个多世纪以后依然沿用这个“强为之名”。明明有条件独立思考的中外

知识分子，少数几位除外，至今统统还在运用“文革”、“文革前”、“文革中的”、“改革开放以来”等执政党定的“强为之名”去对中国现代史进行分期、理顺和叙述性解释。

“懒汉语境”占绝对优势！这就是2016年夏季的形势。

怎么理解“懒汉语境”呢？研究苏联和东欧现代史的美国史学家彼得·霍奎斯特曾经在1997年的时候提过这么一个意见，如果在所谓“冷战”结束之后，研究布尔什维克运动史的历史学家还不开始“重新概括”他所研究的对象，那么就只能说他所从事的史学研究仅仅是“为旧的范式范例提供新的注脚”而已。

需要强调的是，“懒汉语境”中的文革不仅是一个名不副实的术语，它还是一种“解释”和褒贬当代中国史的“捷径”。有了它，发挥它，可以绕过或避免接触很多棘手而复杂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因果关系，本来是应该认真追究和实事求是地解释它，但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或不肯这样做，于是，干脆“赖”到文革身上。

我担心的是，这个学术界依赖的文革已经变成一根思考问题时的拐棍儿，须臾不可离。没有它，就站不起来。比如“文革后的经济改革”与“八十年代的经济变革”这两个提法的含义完全不同。但很多人把文革当作不可缺少的一把刀，必须点一下文革的名，认为一旦点了文革就把解迷的钥匙交给了读者。事情就这么简单！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无好感，另一方面他们的思路实际上和原中宣部的某些秀才差不多。

文革早已经成为一种约束思考、抵制解放思想、必须尽早摆脱的史学桎梏。我曾经在一两次学术研讨会议上强调过，（特别是）青年史学家不要再写类似《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大动乱的年代》这类的书。我劝他们，书是要看的，但后起之秀首先该琢磨的是如何超越它，而不是把一个文革写得更细致，更精确！应该琢磨的是，作为人类历史经验的一部分，发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那一“整块”该怎么去理解和概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但这里的中国历史经验与文革是两码事，前者一定“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而后者如果非要继续“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话，那不过等于不停地提供更多的有关中国、中国人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神话素材。■

【科隆之会】

他们为什么成为造反派

——重庆造反派百人分析

何 蜀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是在一个特殊年代形成的特殊群体：他们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号令和支持下，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行动口号，起来向一些历来代表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者“造反”，造成一种史无前例的奇特景观和动乱局面。

那么，这一特殊群体是怎么形成的？他们的基本情况如何，他们参加造反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研究文革史无法绕开而且应该重视的问题。

重庆的造反派，以1966年8月15日的群体事件（反工作组观点已成为主流的重庆大学师生到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声援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学生）为标志，作为群体派别出现。后重庆造反派以此事件日期统称“八一五派”，一度遭到重庆党政领导组织的群众围攻打压。但随着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态度日益明朗，造反派逐渐发展壮大，到1967年1月下旬，重庆造反派在中央号令及驻军支持下夺取市级党政领导权力，建立起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但夺权激化的内部矛盾使重庆造反派分裂成为坚持革联会夺权执政的八一五派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先因主张“砸烂革联会”而称砸派，后改称反到底派，本文对此不作细分）。

本文以重庆这两派中一百余人（大部分是负责人或骨干成员）为例进行分析。按照其参加造反的不同原因分为不同类型。除个别已故者外，这些人大部分在2011~2013年间参加了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和重庆市图书馆联合开展的文革亲历者口述采访录制，笔者

从寻找口述者到现场提问、事后整理口述文字全程参与。个别未参加口述录制者的资料系调查所得。

一、形成造反派骨干人群的两大主要类型

文革中造反派的鼎盛时期是1967年1月前后，那时基本上形成了“全民造反”的局面，除了被批斗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和长期被专政的“黑五类”外，几乎人人都参加了造反派。但是随着当年1月的“反对经济主义”和2月开始的“镇反”运动，一大批为个人谋求政治、经济权益的人遭到打压后不再参加造反活动（著名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遭到中央明令取缔，重庆一个为临时工争取权益的“反修兵团”也从此销声匿迹），当年春夏间的大规模武斗，又使不少人淡出了造反运动。此后就主要是一些头头和骨干在坚持活动了。

造反派因完全自愿组合，无需审批，一两个人也可以自称“兵团”、“司令部”，因而人数众多，类型庞杂，在相当程度上可称乌合之众。不过，分析具体的个人情况，可以较清晰地看到在造反派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有这样两类人。

1. 抗争型

这类人在文革以前或文革初期，个人或家庭亲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受到过打压或歧视，为争取社会公正和个人权益而参加造反。其中又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文革前个人或家庭亲人受到过政治、经济打压或不公正待遇

陈万明：1941年生，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工人。因经常表现出有独立见解，被领导认为“骄傲”、“不听话”，一直不批准其加入中共的申请。参加造反后成为重庆九八战斗团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八一五派革联会主要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重庆市大渡口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

黄廉：1933年生，重庆木材公司鱼鳅浩木材加工厂采购员。50年代初参军后在部队

上因恋爱对象被认定有“特务嫌疑”而被处理退伍，“反右派”运动中又被领导认定思想属于“中间偏右”，政治上长期遭到压制。起来造反后成为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主要负责人，反到底派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吴凤岭：1932年生，重庆长安机器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前即因工作上的事与车间党支部书记有矛盾而受到压制，文革初期党支部开党员大会也不通知他，遂参加造反，成为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长安兵团后勤部长，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长安机器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李政：女，1943年生，重庆红旗棉纺织厂学徒工。初中毕业后刚工作一年，就因不愿按领导意图昧良心整人而被调到离家较远的郊县，为照顾病重的母亲被迫自动离职回家，母亲被迫离职让她进厂工作。她丈夫也在大饥荒年代读大学时因卖血接济生活困难的母亲而被学校强迫退学并开除共青团籍。这番经历使她形成了一种抗争意识。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针织兵团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重庆针织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轻工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阳增泰：1936年生，重庆朝阳电机厂调度员。因文革前为几个临时工说公道话而得罪领导，遭到批判和下放农场劳动惩罚，文革初期不让他参加官办工人纠察队。起来造反后成为重庆国防系统八一兵团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联会常委，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部总司令。

易永忠：1927年生，长江电工厂供应科科长，中共党员。与领导关系不好，历次政治运动都受打压，被称为“老运动员”，文革初期即被厂党委定为重点批判对象，被迫起来造反，成为八一五派长江电工厂联合指挥部主要负责人，

刘懋雄：1933年生，重庆市市中区学田湾门诊部主任。“庐山会议”后曾在部队被开除中共党籍，后得到平反，转业到地方后又因上小学的儿子路经一施工工地发生事故身亡，有关部门处理时偏袒施工方，对其进行压制，文革中愤而造反，成为重庆工人造反军发起人之一，反到底派卫生总部主要负责人。

李炳南：1939年生，重庆市官井巷民办工业中学校办厂工人。文革前厂里为裁员而重新考工定级，将他原有的六级降为四级，工资减少二十多元。文革中愤而造反，成为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三分团团长。

李正权：1950年生，重庆南山中学初三学生。本是工人出身，却因父亲单位上“四清”中认为其父民国时期在码头当搬运工时做过记账方面的事而认为“历史有问题”，影响了加入共青团。文革初期的官办红卫兵也不让他加入。愤而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黄山红二连（武斗队）成员。

汤双成：1945年生，重庆河运学校学生。因“家庭出身不好”，小学、初中时就曾被视为“右派学生”，考高中受阻，考上中专学校后又被政治老师歧视、打压。参加造反后成为河运校航锋战斗团成员，《航锋战报》、《东方欲晓》报编辑，航锋文艺宣传队编剧。

韩平藻：1947年生，重庆工业学校毕业生。因“家庭出身”问题长期受压，不能加入共青团，文革前“四清”时曾按工作组要求给学校领导提意见，文革初做毕业鉴定时遭打击报复要给他不良评语，愤而造反，任工业校红岩兵团成员，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工作人员。

于克书：1924年生，原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60年代初因向中央反映四川省委领导人李井泉的问题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批判后撤职下放劳动。文革中得到造反派支持，起来上访告状要求翻案平反，两派分裂后参加反到底派活动。

李鲁沂：1947年生，重庆嘉陵机器厂工人。其父文革前在重庆市委组织部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文革中支持父亲上北京告状，自己也起来造反，成为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负责人，军工井冈山“舰队”副司令。武斗中身亡。

②文革初期政治上、思想上受到过打压或歧视

李木森：1938年生，江陵机器厂助理技术员，共青团员。因技术科党支部在文革初期秘密对职工进行政治“排队”时将他排为二类（团结对象）而不是一类（依靠对象），被他知道后愤懑不平而起来造反，成为反到底派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蒋树民：1931年生，重庆钢铁公司运输部钳工，中共党员。因文革初期群众辩论中支持了造反派，遭到保守派批斗，参加造反后成为反到底派重钢遵义兵团主要负责人，反到底工总司钢铁总部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重庆钢铁公司革命委员会委员。

王绍川：1934年生，重庆市第二商业局干部。因文革初期给“四清”工作队提意见，被认为“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党”，并联系其家庭出身（地主）进行批判，被逼上梁山起来造反，成为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联会副主任，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甘廷荣：1946年生，重庆群林服装厂工人。因文革初期给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斥为“反党”，关押审查中逃出，参加造反，成为重庆财贸工人九二一战斗团主要负责人，反到底派重庆财贸井冈山总部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李天鑫：1938年生，重庆市歌舞剧团歌唱演员。文革初期被揭发写了为潘金莲（古代小说《水浒传》中的坏女人）翻案的“毒草”剧本，被工作组组织批判，后起来造反，任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勤务组成员，反到底派文艺界延安兵团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川剧音乐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夏祥贵：1943年生，重庆市沙坪坝区钢材改制厂工人。因为好奇到重庆大学去看了大字报而遭到厂领导组织的围攻批判，被逼起来造反，成为二轻兵团主要负责人，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常委，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谢武周，1936年生，重庆空气压缩机厂工人。文革初本想参加官办的工人纠察队却被拒绝，才知道自己被划为了二、三类，愤而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派八一兵团总部负责人。

杨国成：1941年生，重庆第四建筑公司402工区工人，中共预备党员。因对工作组不准工人与串联学生接触发牢骚而遭到工作组组织批判，愤而造反，成为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勤务组成员，第四建筑公司革命委员会常委。

王以时、邹雨林：王以时1939年生，邹雨林1934年生，分别为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美术、文学组干部。因文革初期被工作组划为“三类”（批评教育对象），给工作组提意见又

被斥为“反党”，遂起来造反，成为群众馆东方红纵队主要负责人和反到底派文艺界主要负责人。

高德安：1935年生，重庆江陵机器厂技术员。从北京工业学院毕业时档案中就被记入有“右派言论”，文革初期被技术科党支部秘密划为“四类”（斗争对象），意外发现后起来造反，成为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主要负责人。

黎敦智：重庆长安机器厂技术员。因对官方宣传诬蔑造反派的“八二八惨案”不大相信，跑去现场了解，被厂里人看到后告发，就被取消了培养入党资格，撤销了车间理论学习辅导员职务。愤而造反，后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长安兵团勤务组成员，反到底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成员，反到底工总司宣传部副部长。

王世伦：1940年生，重庆嘉陵机器厂工人。因给车间和厂领导写大字报提意见遭到围攻，被诬为“反党”，愤而参加造反，后任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主要负责人，军工井冈山总部核心组成员、组织部长，嘉陵机器厂革命委员会常委。

谈孟蜀：1945年生，重庆望江机器厂工人。因反对厂里保守派不准工人看大字报的做法，遭到围攻批斗，愤而造反，后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金猴武斗队连长。

粟远奎：1933年生，重庆市民政局干部，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本是紧跟形势，与民政局几个转业军人联名报告请示建立群众组织，不获批准，还被排斥于官方组建的保守组织之外，愤而起来造反，成为民政局东方红战斗队主要负责人，反到底派机关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

杨向东：1941年生，西南师范学院教师。文革初期被学校领导组织学生批判为“修正主义苗子”，弄到农场劳动。后起来造反，成为重庆革命教职工红旗司令部工作人员，重庆造反派“一二·四惨案联合调查团”宣传部负责人，出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重庆造反派代表。

汤大华：1945年生，四川外语学院学生，共青团员。积极响应号召投身文革，组织了一个联合战斗小组，被工作组认为是“极右学生”的组织，工作组被否定后成为造反派四

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战斗团主要负责人，两派分裂后任八一五派川外星火燎原纵队主要负责人，北碚区捍卫红色政权总部主要负责人。

林亚光：1934年生，四川外语学院教师。因文革前经常发表文章，文革初期即被作为“三家村”式人物批判。参加造反后成为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成员，《井冈山》报主笔。

陈亮：重庆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文革初期因所谓“反动言论”遭到批判，被迫造反后任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造反军战报》主笔。

黄开全：1947年生，重庆师专附中高三学生。因反对学校压制学生思想的做法起来造反，成为师专附中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反到底派重庆井冈山红卫兵勤务组成员，师专附中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倪伯华：1950年生，重庆市巴县四中初三学生。因成绩好而“出身不好”（家庭成份小商），被工作组主持的毕业鉴定评议会认定为“政治不及格”，官办红卫兵抄家时还被控制在校内不准外出以防“向牛鬼蛇神通风报信”，愤而造反，成为校红卫兵团主要负责人，巴县木洞地区反到底派指挥部勤务组成员。

熊小凡：1927年生，重庆市文联编辑。因编辑《奔腾》文学双周刊所编发与写作的作品被工作组批判为“毒草”，后又遭到官办红卫兵抄家，追随罗广斌造反后又遭到打压，后任反到底派重庆市文联东方红纵队主要负责人，工人造反军总部《造反军战报》编辑。

2. 理想型

从年龄看，造反派大多数是“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其中相当部分是学生青年），个别年纪大的则文化低，思想单纯。因长期所受“党文化”教育及宣传灌输的影响，相信应该“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做”、“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认为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是实现革命理想的必由之路。这类人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况：

①深信“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对毛泽东及其党中央号召的政治运动都积极响应热情投入

刘桂兰、孟军：女，均为重庆医学院学生，干部子女，原是最早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发起人，被市委安排为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到北京学习时受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形势影响，宣布“反戈一击”参加造反。

汪友根：1937年生，重庆市供电公司修试场工人，中共党员，劳动模范。参加造反后任电业局八一五负责人，后任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邓长春：1945年生，重庆望江机器厂工人，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常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雷中武：1947年生，重庆电力学校学生，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电校东方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刘德胜：1946年生，重庆江陵机器厂工人。参加造反后任八一兵团（江陵厂）六五团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张利珍：女，1930年生，重庆棉纺织五厂工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一轻兵团成员、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

韩定志：女，1919年生。重庆棉纺织一厂粗纱车间值车工。中共党员。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纺织兵团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厂革委会副主任。

王兰英：女，1946年生，西南农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西农八二六战斗团勤务组成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北碚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黄开华：1944年生，重庆医学院学生，中共预备党员。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重医兵团主要负责人，重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彭期远：1945年生，重庆机器制造学校学生，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机校兵团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姜可忠：1938年生，重庆河运学校教师。参加造反后任河运学校航锋战斗团勤务员，反到底派重庆教工总部勤务员，反到底派工总司勤务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萧星岷：1946年生，重庆市第三中学学生，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井冈山红卫兵勤务组成员，反到底派重庆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谭柏树：1940年生，重庆市曲艺团演奏员。参加造反后任曲艺团“轻骑兵”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联会常委，重庆市曲艺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林家臣：1938年生，重庆前卫仪表厂工人。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前卫兵团负责人，反到底工总司办公室副主任。

邱开全：1943年生，从部队复员回乡任重庆市北碚区红岩公社回龙大队常年基建队指导员，中共党员。参加造反后任北碚区复员转业退伍军人造反纵队秘书长，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团长。

岳朝亮：1942年生，西南师范学院学生，中共预备党员。参加造反后任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负责人，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

杨捍东：女，1944年生，原名杨素芝（为表达“捍卫毛泽东”的信念而改名），西南师范学院学生。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派西师春雷造反兵团成员、北碚龙车寺八一五派广播站广播员。1967年武斗中被俘后因拒绝投降被杀。

郭淑泉：女，西南师范学院学生。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总部秘书。1967年武斗中因收拾文件撤离驻地稍迟被追兵赶上枪击身亡。

李盛品：1946年生，重庆大学机械系一年级学生，参加造反后是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成员。在1967年大规模武斗爆发后参与试制手榴弹时失事身亡。

于可：又名于为贵，1944年生，重庆医学院66届毕业生，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重医兵团成员，《东方欲晓》报主编。1967年武斗中到现场拍照被对方钢钎刺杀身亡。

雷盛凤：女，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学员，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派七医大红色造反总团成员、八一五派杨家坪地区捍卫红色政权广播站工作人员。1967年武斗中为前线人员送饭

时中弹身亡。

扈来明：1946年生，重庆市第一中学学生。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派重庆群林市场“痛打落水狗”广播站站长兼主播。

杜显怡：女，1951年生。重庆市第一中学初二学生。参加造反后任一中八一五战斗团勤务组成员，一中革命委员会委员。

梁自巧：女，1950年生，重庆市第二十中学学生。参加造反后任二十中八一五暴烈支队队长。1967年8月初武斗中救护伤员时中弹身亡。

刘先裕：1947年生，重庆市第四十一中学学生，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重庆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

张光耀：1947年生，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学生，参加造反后任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主要负责人。1967年8月初武斗中救护伤员时中弹身亡。

李祖楞：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学生。参加造反后先是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后任反到底派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主要负责人。

熊文书：1948年生，重庆市第四十一中学学生。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派四十一中东方红战斗团主要负责人，重庆市市中区革联会委员。

胡明富：1948年生，西南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西师附中无产者战斗队主要负责人。1967年8月初武斗中身亡。

任树林：1947年生，重庆师范专科学校附中学生。参加造反后任师专附中八一五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联会常委，重庆师专附中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杨金华：1945年生，重庆机器制造学校学生。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机校兵团勤务组成员，机校联合兵团武斗队主要负责人。

范天杰：1946年生，重庆河运学校学生。参加造反后任八一五派河运校东方红战斗团主要负责人。

李方成：1938年生，重庆天原化工厂教育办公室干部。参加造反后任重庆工人造反军

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反对武斗的《战恶风》报主编。

冯炼：1946年生，重庆铁铸管厂助理技术员。参加造反后成为八一五派成员，后成为反对武斗的重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战恶风》报编辑。

任光泉：1945年生，重庆市经委技术局干部，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任重庆市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发起人。

沈世鸣：女，1931年生，重庆日报编委、报道组组长，中共党员。参加造反后任新重庆报九一四纵队主要负责人，反到底派《文攻报》主编。

②因长期接受的一些理想教育及传统文化影响所形成的坚持真理、维护社会公正、为弱勢者打抱不平的思想而走向造反

熊代富、黄顺义、秦安全、周家瑜、周孜仁：均为重庆大学学生，因校长郑思群被市委工作组迫害致死（他们并不是要保校长，在此前此后也照样批判“郑思群黑帮”，但是对工作组导致郑思群自杀和压制学生意见的许多做法强烈不满），愤而造反，熊代富、黄顺义、秦安全、周家瑜成为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主要负责人，熊代富后任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常委；黄顺义、秦安全后任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家瑜后任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周孜仁成为《8·15战报》主编。

唐忠明：1944年生，重庆师范专科学校66届毕业生，共青团员。因对校方将几个曾给校领导提过意见的65届毕业生长期不予分配工作留校劳动感到不平，文革初期组织“排炮战斗小组”提出批评意见，遭到校方及工作组的打压，被逼造反后任师专八一五主要负责人，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部参谋长。

韩荣华：女，1942年生，重庆市江北区饮食服务公司江北城青春理发店理发员，共青团员。江北发生造反派与保守派冲突的“八二八事件”时为遭到诬蔑的造反派学生辩护而遭打击，参加造反后任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成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蔺习廉：1942年生，重庆长江机床厂热处理技术员，共青团员。因支持了学生对学校

伙食提出意见的大字报，文革初期被“四清”工作组当成批判重点，愤而造反，成为八一五派机械兵团负责人，重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长江机床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王三恒：1931年生，长航重庆分公司水手。对长航领导组织人围攻河运校学生表示不满而遭打击，愤而造反，成为反到底派长航红一方面军负责人。

贺锡君：1933年生，重庆铁路分局宣传干事，团委副书记，中共党员。本未参加造反派组织，因1967年春“镇反”中一个几十个职工的三等小站就抓了三个“反革命”，都是他熟悉的青年团员，为打抱不平而参加造反。后任反到底派红色火车头公社负责人，反到底派驻成都联络站站长。

上面所做的分类，依据的是思想动机的主要方面。实际上，这些人有不少是抗争与理想兼有的“混合型”，只是其中一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二、造反派基本队伍中的大量一般人群

这类人既没有遭受过政治、经济上的打压因而无抗争要求，也没有强烈的理想目标，只是因在“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中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唯恐在政治运动中落后于人，决不能被“革命队伍”所抛弃（按当时的说法“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做“革命动力”就是“革命对象”），因而采取“随大流”的态度跟着主流人群行动。可简称“随大流型”。他们人数极多，其中有的人也被潮流推上了造反派的领导岗位。

甘炳惠：女。1944年生，北碚区东阳公社农民，中共党员。参加造反后任红农八一五战斗团及八一五派农联会勤务员，四川省革委会委员，共青团北碚区委书记。

李何明：1937年生，重庆市江北区东方红公社农民，共青团员。参加造反后成为红农八一五江北分部主要负责人，江北区革命委员会常委，江北区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

苑隆伟：1947年生，重庆建设机床厂工人。参加造反后成为八一兵团（建设厂）6657团“狂飙”队负责人，建设厂“群众专政大军”副总指挥。

何汉瑞：1940年生，重庆无线电厂工人，中共党员。先是保守派，后参加造反派成为军工井冈山无线电兵团负责人，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站长。

蒋兴中：1936年生，重庆无线电厂工人，中共党员。先是保守派，后参加造反派成为八一兵团（无线电厂）2701团负责人，厂革命委员会委员。

姚永年：1937年生，建设机床厂工人，中共党员。先是保守派，后参加造反派成为八一兵团（建设厂）6657团负责人。

韩庆昌：1933年生，重庆建设机床厂技术干部，中共党员。先是保守派，后参加造反派成为军工井冈山建设兵团负责人。

杨广德：1949年生，重庆柴油机厂学徒工。参加造反后成为反到底派黄山红二连排长。

三、一个特殊的造反小群体

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这个以罗广斌为首的长篇小说《红岩》作者群、重庆市文联三人创作组，在重庆造反派中突出的特点一是年龄大（三人分别生于1924、1925、1922年，而一般造反派以出生于四十年代前后者为多），二是三人全是中共党员而且罗、刘是有革命资历的原地下党员（一般造反派中党员很少），三是罗、杨曾得到江青的接见并赠送《毛泽东选集》和转达毛泽东对小说《红岩》修改的意见，这是其他造反派很难得到的殊荣。三人参加造反后成为重庆市文联红卫兵战斗组、文联文革筹备小组实际负责人，两派分裂时站在反到底派一边。罗广斌被八一五派批判、关押后自杀。

这个特殊的造反小群体，既有理想型的一面——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反对独裁专制的斗争，罗广斌、刘德彬作为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并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脱险，杨益言曾被疑为地下学运人士抓捕（后保释出狱）。他们以后因宣讲狱中斗争和革命烈士事迹、共同写作长篇“党史小说”《红岩》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他们的造反又有抗争型的一面——罗广斌“出身不好”（父亲是国民党官吏，哥哥是国民党起义将领），

从国民党狱中出逃的经历又长期遭到怀疑和反复审查，刘德彬在“反右派”运动后被以“严重右倾”罪名撤职下放劳动并剥夺了在小说《红岩》出版时署名的权利；文革初期批判文艺黑线时，因小说《红岩》的关系又使他们与“黑帮”周扬、夏衍、沙汀、马识途等多有牵连，被要求揭发、交代。不过，促使他们造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文革前因小说改编电影的曲折过程和文艺界整风中所得知的相关情况，使他们了解到高层斗争的一些动向，小说《红岩》又得到江青的关注（布置改编为样板戏和计划重拍彩色电影故事片），使他们认为已得风气之先，以为自己具有了革命作家的代表身份和引领革命文学的历史使命，从而积极造反，成为重庆造反运动初期激进而有影响力的人物。

四、一些五花八门的另类造反派

1. 因偶然事件而成为造反派

这部分人与“随大流型”不同之处在于，参加造反派很大程度上是因偶然事件的推动、裹挟。如果没有这一偶然事件，他们或许一直会游离于造反大潮之外。

吕炎：1934年生，长江航运总公司661工程指挥部测量分队分队长。1966年8月在三峡一带的测绘工作告一段落回到重庆汇报工作后，被要求当晚即以官办“工人纠察队”身份到机关大楼值班，他提出自己有一两年没回家，小孩出生8个月了还没见过面，要求先回家休息一两天，被拒绝，一气之下自行回家，此后即参加造反，成为661指挥部航道兵团负责人，八一五派长航兵团主要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航重庆分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郑志胜：1943年生，重庆大学学生。刚进重大时曾得到校长郑思群关心，送给他一双胶鞋。工作组发动批判郑思群时公开表明保郑思群的态度。郑思群被工作组迫害致死，他满怀悲愤参加对工作组和市委的造反活动，但仍被造反派同学视为“老保”，常遭训斥和打压。武斗开始后他正打算回老家躲避，却被时任八一五战斗团负责人的本班同学黄顺义

请其协助处理本派死者尸体，他不敢拒绝，只好留下，遂成为收殓武斗中八一五派死者遗体的负责人，著名的“尸长”。

曹登驹：1947年生，重庆师专附中学生。本对政治运动持排斥态度，因偶然随同学一起参加了声援师专造反派的“八一五事件”，被卷入争论中心，从而成为师专附中八一五兵团骨干成员，师专附中八一五驻北京观察员。

蒋良知：1941年生，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公社兴禾抽水站技术员，共青团员。本未参加群众组织，因到附近工厂的反到底派好友处玩，突遇八一五派前来袭击，被迫随该厂好友一派撤离，从而被卷入武斗，并在武斗停息后被推选任反到底派重庆农民革命到底总司令部勤务员，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贫协副主任。

朱登明：1939年生，重庆市市中区建筑修缮联合社第四建筑社施工员。因“家庭出身不好”（父系原国民党官员被镇压），本不会参加造反派，但因重庆师专发生“八一五事件”时正在现场担任师专图书馆楼房大修施工员，被认为支持了学生造反，由区委工作组隔离审查问罪，被迫逃出后参加造反，成为重庆工人造反军一支队主要负责人。

2. 为保本单位领导而与上级工作组发生冲突成为造反派

造反派与保守派本来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但在这类人身上却奇妙地结合到了一起。由此可见文革造反运动复杂的一面。

刘祖国：1942年生，重庆江北造船厂工人。因对“四清”工作组打击厂领导不满（认为厂领导是好人），受到工作组批判，在学生帮助下起来造反，成为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勤务组成员，反到底派二七战斗团总部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唐工：本名唐湘捷，1942年生，重庆市大坪中学教师，共青团员。因对工作组打击学校领导表示抗议（认为学校领导是老地下党、“焦裕禄式的好书记”）而成为工作组批判对象，被逼造反后成为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宣传部长。

3. 为反对造反派而成为造反派

这类人一开始就从感情上与造反派对立，但在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后，按照“凡是敌

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流行观念，他们往往就站到了与他们所反对的那部分造反派对立的一边，尽管这一边也是造反派。

徐勃：1936年生，重庆市曲艺团评书演员。因不满于罗广斌等在重庆“一二·四”事件后编造事实打击保守派，自费上京控告罗广斌。当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后，被反对罗广斌的八一五派吸收为宣讲罗广斌“历史问题”的广播员和“叛徒罗广斌罪行展览”讲解员。

龚联建：1936年生，重庆消防器材厂工人，中共党员，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人业余话剧团演员。因不满于罗广斌等编造事实打击保守派，自费上京控告罗广斌，当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后，参与了到重庆市文联向罗广斌一派夺权的行动，任八一五派四川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重庆团勤务组成员。

杨世元：1932年生，重庆市文联业务组组长，中共党员。罗广斌等在文联造反夺权后被当作“黑帮爪牙”监督劳动，当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后，反对罗广斌的八一五派将其解放出来参加批判罗广斌的文字工作，成为革联会罗广斌专案组工作人员。

袁光厚：1931年生，新华社重庆记者站记者。被造反派当成新华社四川分社“黑帮”的“红人”批判、“夺权”（剥夺工作权利），当由造反派夺权的重庆记者在重庆造反派分裂后集体站到反到底派一边时，他因受排斥而独自站到了八一五派一边。

刘国章：1947年生，重庆市第十中学学生。因曾参加官办保守组织而遭到造反派（当时统称八一五派）批斗，当造反派分裂后，就站到反对八一五派的反到底派一边，成为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红一连成员。

4. 为应付造反派而成为造反派

这类人开始是“假造反”，但在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后，往往会在两派恶斗中弄假成真成为其中一派的成员。

张光明：1933年生，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秘书，中共党员，市委驻重庆大学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工作组遭批判后被扣留在重大做交代，为了脱身，请示市委办公厅领导同意后组织了假造反的战斗队，写出一些东拼西凑的大字报后得以离开重大。后任重庆市

革筹组（由驻军和八一五派控制）工作人员。

李明全：1935年生，中共重庆市委国防工业政治部组织处干部，中共党员。为防止外单位来夺权致使国防机密档案外泄，组织了国防工办八三〇战斗队先行夺权，被认为是“假夺权”，遭到八一五派打压后成为反到底派市委机关井冈山总部工作人员。

5. 为了好玩而成为造反派

文革前夕社会生活已极端政治化，稍稍吸引人一点的文艺作品大多遭到批判、查禁，文娱生活极度贫乏。当文革进入半无政府状态的群众造反运动阶段，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就以好玩的心态投入其中。

黄荣华：女，1945年生，重庆长江电工厂工人，共青团员。看到造反派的人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很好玩而去参加，后被推选为长江电工厂八一五联合总部常委，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邹越滨：1947年生，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学生，共青团员。为了跟同学在一起好玩而参加造反派活动，成为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造反派分裂后，也因为班上要好的几个同学都在八一五派而站到八一五一边。

6. 为了加入“革命组织”而成为造反派

这部分人的共同点是“出身不好”，长期以来想“革命”而不成，无论怎样努力表现，大多会被共产党、共青团组织排斥在外，文革初期的官办红卫兵也不准参加。他们渴望能得到“革命组织”的认可，摆脱“家庭出身”笼罩其身的阴影，因此一旦有造反派组织可以加入，就如获大赦，欣然前往，但少有“造反”的具体动机，更多的是追随“革命”、成为“革命队伍”中一员的愿望。

黄肇炎：1943年生，重庆大学机械系学生，共青团员。因父亲在抗战时期是政府军的军医（中共执政后被认为是在“反动军队任职”的“历史问题”），使他一直受到歧视压抑。参加造反后任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成员，《8·15战报》编辑，但重大八一五的红卫兵仍以“家庭出身”问题不让他加入，因此他只是造反派而并非红卫兵。

杨晓渝：女，1950年生，重庆市第三十中学学生。生父在50年代初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名镇压，继父因“资本家出身”在文革初期被批判、抄家。参加了反到底派工农兵文艺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陈共珏：女，1949年生，重庆市第四十一中学学生。母亲被打成“右派”，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因参加过抗日远征军），文革初期被抄家。参加了反到底派井冈山红卫兵。

向卫国：女，1949年生，西南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因父母都是地主成份，自己的班干部职务也被撤销。参加了反到底派西师附中“布尔什维克”，后任重庆反到底机关司令部工作人员。

7. 为摆脱“右派”处境而造反

文革初期社会上即流行一个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因此那些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人（即使后来已经“摘帽”但仍被视为“摘帽右派”）极少敢于参加造反。当造反运动进入高潮，原来打“右派”的那些当权者纷纷成了低头挨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局势难免不让一些“右派”心动，于是就有一小部分人以不同心态参加了造反活动。

①以参加造反派的行动表明自己已经“改造”好了，愿为革命做贡献。

杨宝智：1935年生，原在中央音乐学院被打成学生“右派”，后在重庆市歌舞剧团监督劳动，任小提琴演奏员。为表示已经“改造”好了，积极参加样板戏排演，并参加反到底派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积极担任演奏员兼作曲、编剧。

②想通过参加造反派活动得到造反派帮助解决调动工作等个人问题

蒋维亮：1932年生，原在重庆市文化局艺术科被打成“右派”，“摘帽”后仍被强留农场劳动不让回城，要求辞职回家都不准。文革中参加造反派，积极绘制宣传画、漫画，想得到造反派帮助调回城里与家人团聚。

③这部分人主要是有原地下革命资历的党团干部，被打成“右派”后从未服罪，文革

中想在造反派支持下争取翻案平反。

卢光特：1921年生，原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在重庆市委宣传部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宣布“造反”，自行离开农场外出上访，要求平反，参与成都“兵团、八二六联合调查组”为四川地下党翻案的活动。

刘康：1925年生，原川康地下党派到重庆的负责人，在重庆市委党校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起来造反，积极参加成都“兵团、八二六联合调查组”为四川地下党翻案的会议，串联农场难友为卢光特上访要求平反募捐。

以上只是按照各人参加造反的主要原因所做的分类，实际情况应更为复杂，有的人会兼有不同原因，比如抗争型的人也兼有理想色彩，随大流型的人也会有出于好玩的动机等等。

通过以上实例分析可以看出，文革中的造反派，从总体上说，确实是“奉旨造反”，即使是有个人维权动机的抗争型人物，如果没有毛泽东及其党中央的号召、鼓励和一时的纵容，也不可能向有关执政者“造反”并群聚成“派”。一旦毛泽东决定从“大乱”走向“大治”了，造反派就无不紧跟、照办，争相撤销总部，解散组织，还要热烈表态“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2015年5月18日初稿

2016年2月6日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因何蜀先生未克与会，此论文由法国洛林大学传播系博士生迟淼女士代为宣读）

【科隆之会】

血腥之夏：从“七·三”到“七·二七”

——广西与北京造反派的覆灭

秦晖

七·二七事件：“造反派真的反了”？

1968年7月27日，三万名工人、解放军（后来得知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中南海御林军8341部队军官带领下，以人海之势闯入清华，当时正在“武斗”的清华“井冈山”与“四一四”两大派都不知怎么回事，在校内处于优势的“井冈山”派头头蒯大富多方与北京及中央文革当局联系了解缘由，但所有电话都不通。在再三联系无果后，蒯认为自己已被封锁，这是“黑手”搞的“反革命镇压”，甚至怀疑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遂下令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伤亡。校园被占领后，蒯大富等人狼狈逃出，毛泽东遂于次日“召见”包括蒯在内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见到自己誓死效忠的毛主席后放声哭诉“黑手”的行为，不料毛声称“黑手”就是自己，并严厉训斥了蒯大富等人。包括蒯在内的“五大领袖”从这天起全部从失势走向垮台，清华、北大等北京主要高校的造反派也从此土崩瓦解。毛泽东派出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后简称“工宣队”）完全控制了各校，建立了后来史家所称的“后文革秩序”。

几十年过去，蒯大富对这段戏剧性变故仍感到大惑不解。他在回忆文字和口述中多次说，自己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系，与当时的很多中央领导保持有可靠联系渠道，而且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与时任北京市革委负责人的谢富治等首都主管也有频繁的工作联系，如果有人通知一声“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他定会全力配合，怎么会进

行抵抗，以致造成伤亡铸成大错？¹就连当时属于与蒯大富敌对的“四一四”派头头孙怒涛等人，对此也有同感，他们与蒯再对立，也不会相信蒯有胆量对毛公然抗命。²由于毛泽东在“7·28召见”时一方面严厉训斥，一方面在蒯大富哭诉时毛也激动流泪，还明确声称在清华两派中他反对四一四而偏爱团派，并当面交代在场各领导人不要整蒯，所以蒯大富至今相信毛直到最后还是尽力保护自己的。只是不知怎么阴差阳错沟通有误，导致“历史因此改写”。

可是，在七·二七当日参与其事的当局方面，两个当事人后来却对此事做出了几乎截然相反的叙述：首先是当时担任北京市第二把手——仅次于谢富治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是常务副主任）的吴德，他在新世纪初出版的回忆录中说：

“清华、北大的武斗制止不下来，毛主席决定同时组织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决定以后，谢富治让我赶快找蒯大富，让他表态服从这一决定。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华，跑到北航去了。他来了，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说一定执行。当时，想不让蒯大富很快回去，拖住他，利用谈话的时间使工宣队、军宣队顺利进去。我们在谈话时，工宣队就进去了。蒯大富提出他要回去了，就让他回去了。哪知道蒯大富回去后，让‘井冈山兵团’拒绝这个决定，并且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土武器和手榴弹打死了四五个进行劝导的工宣队的成员，同时还打伤了几个。……工宣队进驻，遭到了‘井冈山兵团’的武力对峙。这样不行，毛主席就召见‘五大领袖’。……主要是说服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也安慰了几句。”³

按吴德的说法，工宣队进占清华这件大事事先是正式通知了蒯大富的，而且吴德还信誓旦旦地说通知者就是他本人。据说蒯大富当时满口答应“一定执行”。然而放他回清华后，他却马上变卦，下令清华井冈山武力对抗工宣队，结果造成了流血事件。

吴德的说法符合迄今认为蒯大富对流血应负全责的官方说法。但是这个说法的逻辑却

¹ 2013年6月23日访谈蒯大富，深圳。关于这个话题他也有过多次文字表述。

²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第627页。

³ 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44-45页。

十分混乱。按此说，蒯大富在七·二七当天是从北航被吴德找去，在清华以外的某个地方接受通知的。而且“我们在谈话时，工宣队就进去了”。这也就是说通知蒯大富与工宣队的行动是同时发生，而不是事先通知的。这本身就与决定派工宣队后“赶快”通知蒯大富的说法相矛盾。既然这天直到工宣队进去时蒯大富还根本就不在清华而且也没有被通知，他怎么能够“一定执行”配合工宣队进驻的决定就令人费解。何况吴德下文又明言，当时他们本来是想借谈话“拖住他”不让他回清华的，只是后来轻信了他的假意承诺才放虎归山（从而由于他的背信弃义导致了流血）。那么按吴德等人的原定安排，应该是一开始就没有指望他“执行”什么决定的？

而蒯大富和其他人的回忆则相反。按蒯的说法，当天上午“没有任何与往日不同的征兆”，他与团派的几个人到北京站接人，11点回来时工宣队已经大量涌入，最初团派广播还说热烈欢迎，后来就发现工宣队以50倍于清华人员的人海，把清华的各个楼分割包围，而且开始抓人，把团派的二号头头鲍长康和总部委员高季宏等都抓走了，双方爆发冲突。据说他当时的感觉就像“王洪文在上海围攻柴油机厂那样”。蒯等连续给北京市革委和中央文革打电话询问怎么回事，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到下午三时团派冲出楼外进行“突围”反击工人，蒯大富乘机出清华赶到市革委会，找谢富治未果，找到吴德。而就在他离校后冲突进一步升级，工宣队出现伤亡。吴德告诉蒯已经闹出人命，严厉要求他服从。双方争执到晚上，约20时蒯大富才随市革委的人回到清华，在校外的清华园中学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后蒯大富回团派总部，说服他们带队撤离。（由于被分割包围，团派个别据点如9003大楼并未得到通知，在蒯大富等人撤离后仍抵抗了一段时间）离校后蒯先去了体育学院，找车到城里电报大楼拍电向中央求救，然后到北航，这时已是28日黎明，蒯在此被找到，赶去参加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召见，这时蒯大富才知道工宣队的行动是出自毛泽东的命令。¹

¹ 蒯大富：《潮起潮落》，载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中国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366-369页。其他相关著述如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等，均与蒯大富所述大体一致，只是一些时间略有差别。

与吴德所说相反，蒯大富的回忆是他事先根本没有得到通知，工宣队进入后是他找的吴德而非吴德找的他，这时清华已经死了人，而到这时吴也只要求他服从，仍没有告诉他是毛泽东的安排。他们晚上才回到清华，此后也并未发生吴德所说蒯大富背信毁约下令抵抗的事。

两种说法谁更接近事实？几年后毛泽东昔日的心腹近臣谢静宜又发表了另一种回忆。在七·二七行动中负有传达圣旨和汇报行动进展重任的谢静宜说：¹

毛泽东在7月24日就决定“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进入大学，“捅它这个马蜂窝。”据说，毛泽东这时“像指挥打仗那样精神振奋，语言激昂”。而且，毛当时就指出：这样的行动“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谢静宜回忆说她当时就“惊呆了，脱口问道：‘这是真的啊？’”

谢静宜接着说：毛泽东在做出“捅马蜂窝”的决定后，首要的考虑就是对清华两派人士乃至一切与清华沾边的人严密封锁消息，而且做得滴水不漏。毛泽东亲自交代，参加行动的工人必须来自“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更有甚者，据谢静宜说：同样“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毛泽东不仅布置了严格的保密，而且让北京当局以疑兵之计迷惑“清华的人”：（行动前）“那几天，由北京市委组织工人在大专院校周围游行，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不进校，游一阵子回来。”这样就给人以并非要采取强制手段的假象，同时完成了大规模人力部署。27日当天，“指挥小组一声号令”，三万多工人、农民、军人分成8个团，“浩浩荡荡向清华大学进发。到后，仍像前两天一样，先在学校周围游行，麻痹他们一下”。10点钟准时，8个团“按事先的分工，同时从各大门一齐进校，到达各分工地段”，从而成功地完成了这次“捅马蜂窝”的突袭占领行动。

显然，谢静宜的说法与吴德说的大相径庭：工宣队进占清华的决定不仅没有事先告知

¹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75-185页，下引谢静宜回忆录不另注者均同此。

蒯大富，而且处心积虑地就是“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不仅不通知，还严格保密。不仅严格保密，还一直采取种种疑兵之计“麻痹”清华人直到最后一刻，就是要让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24日说出“捅马蜂窝……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这句话。他要警惕什么？是要警惕发生暴力、避免流血吗？常人都会想，如果是要避免这样的后果，假如对手是“敌人”，那就应该摆出兵临城下的阵势去与其谈判，争取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不是讲一些“要文斗不要武斗”、“实行革命大联合”之类的空话，而是发出最后通牒：某日前如果你们还不撤离，我就要出动大队人马强行解决了。毕竟那“敌人”只是搞搞派斗，没有任何实力可与专政机器对抗，用得着“奇兵偷袭”吗？

而如果对手不是“敌人”，只是毛泽东的一些昏了头的崇拜者在内斗，毛泽东原则上劝说无效，那就更应该明确放话：某日前你们再不听话，我就要派大队伍进驻了。或者说，由于你们不听话，我已决定派大队伍进驻，你们必须配合、服从。正如如今无论当年“老团”还是“老四”的朋友都共同认为的：“造反派”再怎么“无法无天”，毕竟两派都以“毛主席的红卫兵”自居，七·二七那天只要知道那几万工人军人是毛主席亲自派出，是绝没有人敢于公然对抗的。

总之，无论毛泽东把清华两派或某一派是看做敌人还是看做自己人，为了避免流血毛都应该向他们摊牌，告诉他们他将要采取的措施并责令他们不得抗拒而且予以配合——吴德的说法正是按这一逻辑编排的。实际上，这不仅是避免流血的必要条件，显然也是充分条件。“清华的人”如果是敌则没有对抗能力，如果是友更不可能有对抗意志。只要他们知道三万大军来自毛泽东，流血对抗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进而言之，事先通知清华不仅是避免流血的“充要条件”，也是极易实现的条件。蒯大富作为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系“小将”，过去一直与“文革首长”保持有直接的联系通道，作为北京市革委成员，他也一直与市革委主任谢富治保持工作联系，无论通过中央文革还是通过北京市革委，与他沟通完全是自然之事。

但是按谢静宜的描述，毛泽东恰恰就是要刻意消除这个条件。

其实，近期一些研究已经指出，毛泽东当时准备采取的行动，其许多内容早就为清华校内，尤其是四一四派的一些人多次建议过。唐少杰指出：四派曾数次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建议对清华实行军管或直接派群众队伍进入清华，档案中可见的最后一次是在7月26日，即七·二七前一日。四派提出建议：“可否由谢副总理带头，组织北京工人、农民、解放军、中学生、大学生，连续一个星期每天以几万人的队伍，轮流到清华、北大这样武斗最厉害的地方，封锁最严的据点周围游行示威，宣传七·三布告，创造和平气氛，并在此基础上再采取解决措施，拆除工事、上交武器和全部停止武斗的问题。”¹

表面上看，第二天实际发生的事与这个建议在许多方面十分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毛泽东的行动对所有“清华的人”乃至“与清华有联系”的人保密，提出上述建议的四一四派也被蒙在鼓里，毛泽东并没有寻求他们配合。第二更重要的是：看似类似的建议其实用意完全不同。四派建议派人到清华周围连续游行，宣传七·三布告是为的“创造和平气氛”，以便在两派关系缓和后“再采取解决措施”。但毛泽东搞的和平宣传却是要“麻痹”清华人（包括四派在内），以便发起突然袭击、使出激烈手段。

很明显，在三万大军突然从四面八方同时涌进校园时，校园内包括两派头头在内不到两千的清华人（大部分师生已因武斗而离校）无疑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不是蒯大富或沈如槐对他们隐瞒了真相，而是如谢静宜所说，是毛泽东刻意“不让清华的人发觉”自己的意图，而且用种种计谋把他们“麻痹”到了最后一分钟。这样，当这不到两千人发现自己陷于三万多人海突如其来的围攻时，平心而论，他们有几个人能正确判断当时的局势，而不发生“误会”？恐怕区别只在于对“误会”的反应方式而已。对于当时在武斗中完全处于劣势、实际已经陷于绝境的四一四派而言，他们的“误会”更可能在于把围攻者看成是自己的救兵（其实后来证明毛泽东对四一四并无好感，只是这时他首先要整的是蒯

¹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简报》，清华大学档案馆藏，转引自唐少杰：《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历史引论》，载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52页。

大富),不加抵抗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即便不认为来者是救兵,抵抗千余名团派围攻已经精疲力竭难乎为继的“老四”也不可能再去抵抗新闯入的三万人。而对于校园内占优势的团派而言,可以肯定,所谓的“黑手发动反革命政变”,所谓“工总司踏平上柴事件的重演”,这类“误会”难道只是蒯大富等少数人才会有?在这样的“误会”下,拥有武装而且已经进行了百日武斗的他们会如何反应,难道还用问吗?

这里要指出的是:按谢静宜的回忆,“宣传队”进入清华后,七·二七行动总指挥部曾同团派谈判,为缓解冲突,市领导决定“限工农宣传队只准走的路线,以及规定哪些路线、地区不能进、不能通过”。这本是保障有秩序地“和平解放”清华所必须的规则。当年从傅作义手中“和平解放”北平也是这样的,否则大军一进城就不受协议约束随意乱闯,乃至闯进傅作义司令部去抄家抓人,那还能叫“和平解放”?

但是,毛泽东知道这一规定后却大为光火——

“主席观看完地图站起来气愤地说:‘大学是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办的。什么这条路能走,那条路不准通行?是谁规定的?没有道理。对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来讲,条条道路都是(可以)通行的。什么这条路线不能走,那个地段不能进?岂有此理,(这)是犯了‘路线错误’。’”¹

换言之,毛泽东亲自下令取消了对“宣传队”进清华后一切行动的任何空间限制,并且不容任何商谈。显然,毛泽东的说法完全体现了他时常自诩的“无法无天”风格,根本没理可讲:大学是“全国人民”办的,所以“全国人民”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校园里乱闯?那中南海理论上也属于“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也可以进中南海乱闯吗?即便在文革中最乱的时期?实际上就是后来工宣队管制下的清华园,“全国人民”不能随意进入的空间禁区又何尝更少?

但毛泽东当时这样说,显然也不是基于什么民粹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这个时候的毛泽

¹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80页。按:谢静宜说的是三万人进驻后毛泽东对“市领导”约束宣传队活动的批评。但实际上从全文来看,毛泽东应该是在24日决定“捅马蜂窝”时就主张宣传队在清华可以为所欲为、去所欲去,只是“市领导”没有领会他的旨意,还有点放不开手脚。

东早已不是煽动“造反”的那个毛泽东，他派三万大军进校就是去弹压“造反派”的，只不过他明显是要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事态、人为地增加三万大军与千余学生发生冲突的机率。

而另一方面，他又布置三万人进占校园时都不带武器。要知道这突袭清华的三万“宣传队”虽然没带枪，更没放枪，但他们绝非仅仅是来“宣传”的——尽管他们要“宣传”的《七·三布告》等本身已经是全面镇压造反派的布告，但是此前清华人并没有谁意识到自己会被与广西四·二二划为一类。事实上，毛泽东授意的疑兵之计也正是要让“清华的人”相信那些人仅仅是“宣传队”，而非“占领军”。这就是毛泽东要他们事先在清华校外连续“宣传”了两天、直到当天10点八路总攻发动之前还围着学校和平“宣传”的用意。如前所述，这种和平宣传的目的并不在于施加压力迫使清华人主动退却以避免流血。恰恰相反，毛泽东的用意是“麻痹”清华人，避免打草惊蛇防止“敌方”感知压力做出妥协，使预定10点整发起的“捅马蜂窝”战役没法进行。

因此毫不奇怪，虽然“捅马蜂窝”者没带枪，更没动枪，“但却是事先不打招呼的突然性强制行动，三万多人包围一千多在校学生，不仅‘强行缴械’、拆毁武斗工事，做了‘制止武斗’所必需做的事，而且查抄了学生组织的办公室（当时谓之“抄家”），抓了不少人。事后他们即成为清华的主人。所以，这是一次典型的强制占领行动，尽管占领者没带枪，但甚至不能说是‘和平解放’。因为和平解放也是要有协议的。而团派即便不抵抗也未发生不幸的流血事件，他们也是被强制撵走的，已经不是‘傅作义’了。”¹

毛泽东当时的卫士陈长江曾回忆，毛听周恩来报告说清华发生流血死亡后脱口而出曰：“造反派，真的反了？！”唐少杰先生认为这与谢静宜的回忆有所不同。其实现在看来，毛如果真讲了那句话，恐怕也不会是意外惊讶，而是计谋成功后的惊喜语气。正如唐少杰另一处评论的：“这再次印证了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话语：‘政治斗争就是要引导对方犯错误。’”

2

¹ 秦晖：《“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见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12页。

² 唐少杰：《评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80-81页。

七·二五接见与七·二七行动：从广西看清华

今天提到七·二七，笔者就想起了对我当时曾经参加的“广西四·二二”造反派来说很难忘怀的一幕。那就是“七·二七”几天前的7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中央首长最后一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当时，以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为起点，对“广西四·二二”的大规模剿灭已经在南宁等地进行了半个多月，这次接见其实是正式宣布对“广西四·二二”组织的死刑判决。“接见”后不久，四·二二的代表们便被全数扣押入狱。而我们这些没资格到北京去的普通四·二二成员后来读到广西当局广为散发的接见纪要时，无不感到五雷轰顶。记得一个同学当即念出一句安徒生作品中的话：“啊，我亲爱的奥古斯丁，一切都完了，完了！”

就在这次历时数小时的“接见”中，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在内的阵容庞大的中央首长们异口同声，一面倒地严厉斥责广西四·二二。除了谈广西的事外，斥责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在场的四·二二人员追查所谓的“清华-北航黑会”的情况，尤其是点名追查蒯大富。这些处理国家大事的首长们一个个仿佛成了“专案组”的审讯人员，不仅声色俱厉、不依不饶，而且追问之具体、口气之武断令人惊讶。周恩来首先指责四·二二人员“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康生点名要四·二二代表朱仁把会议情况“原原本本、老实地写出来”，“你在会上怎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陈伯达断言四·二二参加“黑会”是去朝见“黑司令部”，大喝要与会者“把你们的黑司令部端出来！”周、康和陈三人都轮番追问“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吴法宪说：“你们‘汇报团’（按：当时各派来京人员正式名义都叫某某组织赴京汇报团）不向中央汇报，到清华、北航汇报，汇报什么？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陈伯达并说：蒯大富、韩爱

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险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周恩来最后要求四·二二人员回去写交代，“一定要把你们这六百多人（按：四·二二代表远没有这么多，‘六百多人’似指各省来京及北京高校造反派人员被认定参与‘黑会’者的总数）的活动、串联黑会都写出来。”¹

这份接见记录表明几点：1，“中央首长”们认定广西的问题并不孤立，各省及北京的造反派正在形成一个统一的“黑司令部”，而“清华-北航黑会”就是一个重大标志。2，清华（当然是指“清华井冈山”）与蒯大富被置于这个“黑会”的重要位置。而且从反复点名追查清华和蒯大富（有趣的是除了陈伯达提出韩爱晶和蒯都要“去劳动”外，当场再没有人提到韩，除并列指责“清华、北航”以外也没人单独提到北航，却几次单点了清华）的语气看，中央首长们已经完全把其看做整肃对象，不但整材料整到了广西人那里，陈伯达还明确说要把蒯清洗出政治舞台。3，与会的“中央首长”很多，而且来自我们现在知道其间矛盾很大的各个派系，如中央文革文人集团和林彪军人集团，以及超越诸集团之上的（也有人认为是自有一集团的）周恩来等，但他们这时在处理造反派的问题上态度高度一致，显然，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能够整合出这样的一致。

读了这份记录，谁还会认为两天后的数万“工宣队”进占清华之举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谁还会觉得蒯大富那天到处打电话都碰壁只是阴差阳错的沟通问题？

关于“清华、北航黑会”

那么，这四·二二人员参与了的“清华-北航黑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七·二五接见在七·二七之前仅两天，但接见记录公布，让我这样的世人读到则已经是在七·二七事后。接见中周恩来说：今天讲的内容“反正朱仁是会传出去的（意指传给

¹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整理：《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注明的整理时间为1968年7月26日，28日起该文件在广西以传单、号外等形式大量散发。本文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按：1967-68年间中央首长每次接见广西两派的记录都有两派和广西官方（军方）各自整理的两三个文本，但最后一次接见时“四·二二”事实上已经失败，所以只有这一个文本。

蒯大富这类“黑会”中人)，我也不怕你传出去。”这显然是讲反话，接见后不久即失去自由的朱仁及其他广西人大概不可能给蒯大富们通风报信（且不说他们根本还不认识）¹。我们现在知道“清华井冈山”是非常重视搞情报（所谓“动态”）的，但这两天他们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或者风闻了也未重视。直到现在，清华文革中人写回忆录虽未汗牛充栋也已经卷帙颇为浩繁了，七·二七也是这些回忆录经常提到的，却未见到有谁提及这件对清华井冈山似乎是相当致命的事。后来我曾当面问过蒯大富等一些井冈山要人是否记得有这么个会议，居然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²尽管其实毛泽东在7·28训斥蒯时就指责他和韩爱晶串联各省造反派，“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林彪接话：“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但是，事后无论蒯还是清华井冈山其他人谈起7·28召见，谈起他们垮台的缘由，大都还是讲搞了“百日武斗”、武力对抗工宣队等惹怒了领袖，几乎没人提到这个“黑会”。不但如此，后来从毛泽东时代蒯大富被捕坐牢直到邓小平时代正式判刑，列举的罪状中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为什么？我想原因其实也简单：那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蒯大富他们没当回事，一直就没往心里去。而“中央首长”们其实当时对事情的整个经过也已经查的一清二楚。首先，7·28召见时韩爱晶就已解释：

“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

¹ 2014年8月10日访谈中笔者就此问过朱仁本人。

² 就我所见，似乎只有当时北航红旗的戴维堤在其自传《逝者如斯》中介绍了此会的始末。但是他与武传斌一样也称之为“北航黑会”，不认为有清华的什么事，其实清华受此会的影响应该比北航更甚。

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学院东方红）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¹

其实不用韩爱晶解释，七·二五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周恩来对情况已经很清楚，他当时就说：“大革命时我在两广呆过，我为你们难过，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尽管这个说法也不确切（见下文），但无论蒯大富还是韩爱晶，清华（井冈山）还是北航（红旗）都不是会议的主角，他是很了解的。

武传斌先生当时是广东“旗派”头头、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他近年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是我在北京参与串联，组织，主持，在北航召开了一次有十几个省，市在京上访的造反派大会”，即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时所说的“北航黑会”，“之所以拉上清华，那是因为在大会的第一天，我把老蒯也请来上了主席台。但我从未听过‘清华、北航黑会’的说法”；“回广州后，在广东省革委会全会上批判我时，省的主要领导传达中央领导讲话时，定性为‘北航黑会’。‘清华-北航黑会’如有存在，也可能另有所指。”后来他又略作更正说：“68年7月16日第一天的会议是在清华开的，老蒯参加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仅对各地造反派来北京，来清华表示了欢迎和支持，没有更多的讲话。7月17日的会是在北航开的。”²而根据七·二五接见时四·二二参会代表白鉴平所说，会议是18、19日开的，与武传斌40多年后的回忆有两天之差，应以白鉴平当时的说法为准。另一代表高寿仪说：“是广东‘旗派’掌握会场”。³这也与武传斌的说法一致。

至于周恩来指为与武传斌一起成为“黑会主席”的朱仁，是七·二五接见中被多位“中央首长”连珠炮式审问追逼得最紧的一位。据接见记录，当时他在追问下“转弯抹角、吞吞吐吐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⁴但是，近年笔者采

¹ 7·28 召见记录，见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

² 武传斌电邮，

³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1968年7月26日整理，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

⁴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

访他时，朱仁否认了“主持”之说，只是说自己发言介绍了广西的情况，并且说他参加的会议只有一天，是在北航开的，没有在清华开过，如果清华也开了，那自己并没有参加。¹

这个说法与当时作为柳州四·二二代表的钱文俊所说可以互相印证。钱文俊近年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会议似乎是开了两天，但第一天通知他们到清华，却因为当时清华武斗，校园一片混乱，根本找不到会场，实际没有开成会，会是第二天在北航开的。有个清华的到场（钱说他不认识蒯大富，不能确定是不是他）讲了不长的话，主要就是泼冷水。辽宁八·三一的人提议各省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他大惊失色，表示这绝对做不得。也有人说，全国性组织不可行，那就退而求其次，搞个各地造反派互通消息的联络站怎么样？清华的人说那也不行，他们不能参与这样的事。弄得大家很丧气。最后也就是大家发发牢骚，觉得各省造反派都危机四伏前途渺茫，没有任何结果就散了。²

钱文俊说的这个清华人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蒯大富。40多年后笔者采访蒯大富时，他对这个会已经没什么印象，但后来想起说是有这么一个会，他当时就害怕跟各省这些人混在一起，但碍于武传斌他们的面子到北航去了一会儿。“有人提出成立各地造反派联合组织，我跟中央文革和周总理这些首长打过那么多交道，当然知道这是大忌，要惹大祸的，就断然否定了这个馊主意。有人又说那就办个联络站保持联系，我说即便搞联络站也要先请示中央文革，得到中央的明确同意才能搞，否则是绝不能搞的。说完我就离开了。”³

40多年后各人的回忆有些细节出入完全可以理解，但综合这些回忆和1968年当时披露的情况，基本事实大致已很清楚：1968年盛夏时，各省造反派都已面临严重危机（曾短暂得势的大都已经失势，从未得势的则面临更严厉的镇压），他们纷纷组团赴京“上访”。广东的武传斌就出头让这些难兄难弟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搞了个聚会。

时的指示》，1968年7月26日整理，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

¹ 2014年8月10日访谈朱仁，南宁

² 2013年7月8日电话访谈钱文俊。

³ 2013年6月23日访谈蒯大富，深圳。按：清华四一四方面的消息说蒯大富的发言则相当火辣：“①除河南、青海外，全国现在是保守派掌权；②现在不是中央支持造反派的问题，而是反之；③全国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内战。”（见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1968年7月23日条，此信息为孙怒涛先生提供，谨致谢。）但多名与会者都没有这个印象。

所谓“黑会两主席”

为什么是武传斌？因为他领导的广东旗派这时也处在转折点上。旗派在1967年3月曾与偏向“老保”的广州军区有过冲突，但毛泽东发出击退保守的“二月逆流”的旨意后，周恩来承旨飞到广东，于4月18日在广州钦封旗派是革命造反派，其对手则是“保守”的，并要求广州军区支持旗派。我们知道，这一年北京曾多次隔空表态、乃至派出“首长”（如到武汉的谢富治和王力等）前去直接支持各地造反派，使之从逆境中咸鱼翻身，但由周恩来亲自去现场钦点造反派的还只有广东。旗派因此声名大噪。人们现在知道广州军区及其司令员黄永胜对旗派心里是反感的，¹但也不得不予以支持。1968年2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黄永胜是主任，武传斌是常委，两人关系一如北京的谢富治与蒯大富。

1968年3月杨成武倒台后，黄永胜到北京官升总参谋长，旗派却与此后的广州军方及广东省革委主流关系恶化，这其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兔死狗烹由盛转衰是同一趋势。但与其他一些省份的造反派（如广西四·二二）相比，旗派当时面对的形势尚不那么险恶，武传斌也并不甘心。他认为广东军方变脸是黄永胜离开の結果，而黄永胜还是支持自己的。于是便与另一位省革委会旗派常委邱学科一起到北京找黄永胜告状。到北京没能见到黄永胜（黄其实正要整他呢），却发现各省落难造反派纷纷来京上访，自我感觉尚不那么坏的武传斌便出头联络这些“造反派战友”开了那个会，无非是想分析一下形势，并没打算成立什么全国性组织（会上辽宁与会者提出的这个建议并非原先所料）。远在南国的武传斌毕竟不如北京人那么敏感，不知道这是犯了大忌。但他在北京开会总要有东道主，找的自然就是北京的“造反派战友”韩爱晶蒯大富们。韩、蒯尽管当时还风头十足，但经过两年的“政治经验”已经不是1966年时的“初生牛犊”，他们是知道禁忌的。韩同意接待武传斌，是因为武与他一样是省级革委会常委，而且据说还有黄永胜支持，属于他所说的“可靠的造

¹ 叶曙明：《迟泽厚访谈录》。

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并不是朱仁那样的在野人士。尽管如此，韩仍然没有参加武传斌主持的会，只是提供了会场，出席会议的北航红旗成员侯玉山和祝春生据说还很不客气地批评了外省人的过激言论。而这个情况康生也知道。¹

就广西四·二二而言，参加这个会议也是稀稀拉拉的，在京四·二二成员有的只去了北航，有的只去了清华，笔者所知的与会者中，两校都去了的似乎只有白鉴平。更有趣的是，被康生诬为“黑手”、周恩来指为“黑会主席”的朱仁并不是四·二二赴京汇报团的正式成员，而是汇报团已经在京多日后，由于南宁事态危急他自己决定上京“报告情况”，甚至连车票也是自己买的。²在四·二二及其赴京人员中朱仁并不在领导层，康生之所以盯住他，只因为他是广西自治区党校教师，被认为有理论水平。而四·二二“柳铁工机联”一位中学红卫兵此前写有一篇观点激进的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当时与湖南杨曦光（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清华周泉纓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等都是中央点名的异端“大毒草”。康生仅以“中学生不可能看过《哥达纲领》”为理由，就一口咬定中学生写不出这篇文字，肯定有“黑手”代笔，而党校教师朱仁就是代笔者，也就是四·二二中的“黑手”。其实，不要说中学生完全可能看过马克思已全文引述过的《哥达纲领》³，就是没看过，当时的学生不少也从我国“共运史”宣传中知道“哥达纲领”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无原则合并”的结果，那篇文章不过是借此典故来表达其不愿与对立派“老保”合流之意，与《哥达纲领》文本的内容毫无关系，何以非得看过那文本才写得出来？更何况在南宁工作的朱仁根本不认识在柳州的作者。

正如北航的戴维堤后来所说：“现在看来，在所谓的北航黑会问题上，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本来是没有什么错误和责任的——如果讲理的话。第一，韩爱晶一开始就反对开这个会，

¹ 戴维堤：《逝者如斯》之73《北航黑会》，乌有之乡网站。

² 2014年8月10日访谈朱仁，南宁。

³ 接见中有人说看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康生驳斥道：“我说的是《哥达纲领》”。但《哥达纲领》全文本身只有短短四节，马克思认为它“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因此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逐条逐句”地引述该纲领并予以了驳斥。这些引文其实就是《哥达纲领》的全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8、11-35页）因此根本不存在看过《哥达纲领批判》却没有看过《哥达纲领》的问题。康生这样驳斥其实恰恰表明他这个“马列主义权威”其实倒真可能没有看过马克思的这本“经典著作”。

他借病拒不参加，当时能做到这点，就很不容易了。第二，文革中中国人有‘四大’自由，这是毛泽东支持和倡议的。群众组织头头聚在一起开个会，交流一下文革‘信息’。就算发发牢骚，讲了几句出格的话，但没有密谋武装暴动，没有违反宪法的任何行动，凭什么叫‘黑会’？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亵渎。‘北航黑会’不是黑会，正象‘二月逆流’不是逆流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面前，有时候是很难讲理的，因为他们是‘神’。连韩爱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会当成了黑会，真是可笑之极！这件事情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北航黑会’和清华武斗事件使毛泽东大伤脑筋，最终导致他老人家作出了大决策。”¹

北航如此，清华就更不用说。尽管“黑会”是武传斌张罗的，北航韩爱晶只是勉强接待了他，清华连接待方也不是，主要的会议也是在北航开。有的回忆说蒯大富在会上露了个面但没怎么说话，有的回忆说他讲的话是泼冷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清华与这个会的关系比北航更淡薄。武传斌与戴维堤都说他们听到的指责是“北航黑会”而没有清华的什么事。但实际上，从七·二五接见时周恩来指责“清华、北航的黑申联会”，吴法宪说四·二二是“向清华、北航汇报”，其他中央首长也反复追问清华有谁与会、蒯大富讲了什么，直到7·28召见时毛泽东指责的“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显然当局追究清华和蒯大富要甚于北航和韩爱晶。

另一方面，广西四·二二只是受武传斌之邀与会的众多各省组织中普通的一个，既非会议的发起者，也非接待者，更不像辽宁八三一那样在会有特别敏感的发言。当时七·三布告已经发布，广西屠杀正酷，在京的四·二二人员尽管极感冤屈无诉，但恐惧远超于愤怒，已是待罪羔羊心态，哪里还敢挑头当什么“主席”？后来武传斌、戴维堤的回忆对四·二二人员会上的表现也都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当局却把四·二二拔高到突出的位置，周恩来说四·二二的人是“黑会”两主席之一，毛泽东列举的与会者头一个就是广西四·二二。作为当时全国被镇压得最惨的造反派，四·二二那时被“枪打出头鸟”，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就是针对广西颁布的，是全国第一个公开出动正规军队剿灭造反派的布

¹戴维堤：《逝者如斯》之73《北航黑会》，乌有之乡网站。

告（以后才有针对陕西的七·二四布告、针对山西的七·二三布告等）。而七·二七工宣队占领¹清华，就是打着宣传“七·三布告”的旗号。

七·二七行动保密之谜

就在占领清华次日的7·28召见中，出现了这样充满杀气地把广西和北京相联系的话语：

毛泽东：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泽东：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彪：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韩爱晶：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

康生：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毛泽东：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¹ 现在一般说是“进入”清华，其实当时工宣队虽然没带枪更没动枪，但却是事先不打招呼的突然性强制行动，三万多人包围一千左右的在校学生，不仅“强行缴械”、拆毁武斗工事，做了“制止武斗”所必需做的事，而且查抄了学生组织的办公室（当时谓之“抄家”），抓了不少人。事后他们即成为清华的主人。所以，这是一次典型的强制占领行动，尽管占领者没带枪，但甚至不能说是“和平解放”。因为和平解放也是要有协议的。而团派即便不抵抗也未发生不幸的流血事件，他们也是被强制撵走的，已经不是“傅作义”了。

周恩来：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泽东：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¹

这是迟到的蒯大富赶来之前诸位首长对北航韩爱晶的训斥。这些话的核心就是“造反”如今已经被禁止，“谁如果还继续造反”就要被镇压，“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广西四·二二已经被描述成杀人放火的“土匪”、“国民党”、“歼灭”的对象（真相详见后述），而以清华、北航为代表的北京造反派几乎被当做四·二二的后台，他们不仅窝藏“土匪”（“广西佬躲在你北航”），还“想控制全国运动”，加之林彪说的惊人之语：“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这明显与陈伯达所说的全国造反派开会成立“黑司令部”同义。

当时蒯大富人尚未到，谈话就涉及了蒯大富“骑虎难下”的问题。毛泽东宣称：“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在当时语境下，韩爱晶说蒯大富骑虎难下，有为蒯开脱之意，即蒯大富受制于人，身不由己。但蒯大富骑的什么虎？受谁的牵制？无非有上下两个可能。“上”当然不是后来讲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当时他们都与毛泽东一起喝斥韩、蒯等，而且言辞比毛还厉害），只能是说蒯“奉旨造反”惯了，一下子难以适应完全相反的、镇压造反的新圣旨。若如此，这个“虎”就是发布圣旨的毛泽东了，毛泽东自己还能“把老虎打死”吗？另一可能是指“下”，是说蒯大富想转向，他手下的群众不干，那老虎就是指他们。而毛泽东怒称要“打死”他们以便让蒯下来，显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可见，毛泽东如果说对“坏头头”蒯大富尚有一丝怜意，对“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已杀气腾腾了。

另一方面，召见时大家已经知道占领清华时工宣队死伤惨重（以北京“武斗”的标准而言），但毛泽东对此却毫无所动。正如孙怒涛所说：“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731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也没有对下属交代一句要他们高度负责地妥然做好善后工

¹ 7·28 召见记录，见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

作的话。没有！统统没有！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要是他们（死伤者）知道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对蒯大富与对工人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态度，他们会觉得死得其所吗？会觉得伤得值得吗？”¹其实，更过分的是这次召见中，国家最高三人的下面这段对话：

毛泽东：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彪：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这岂止是没有“表示悲痛和哀悼”而已，“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自得之情是溢于言表啊。

在对蒯派群众和工宣队员双方都表现得很冷酷的同时，毛泽东唯独对蒯大富本人表现出很温情。虽然“召见”的主调是训斥，但与其他首长一味声色俱厉不同，毛泽东（一定程度上还有江青）训斥之余不但为蒯大富流了泪，还当面痛贬蒯的政敌“四一四”，表示两派联合仍要以蒯为主，还叮嘱臣下不要整蒯大富。尽管这一切后来都没兑现，但很多人尤其是蒯大富自己仍然觉得这是“挥泪斩马谕”，毛泽东对自己一手扶植的造反明星还是有感情的。

的确，人非草木，不能说毛泽东在拿原先的心腹“小将”祭旗时没有一点怜惜。然而这和“挥泪斩马谕”还是大有区别。且不说当年孔明“斩马谕”时，他那政治家的“挥泪”也有浓厚的作秀意味，但“失街亭”毕竟不是孔明的安排。而七·二七采取这种派出数万人迅雷不及掩耳地搞掉一个“黑司令部”的做法，蒯大富们会有什么反应，伟大领袖难道真的没有意料到吗？受命闯入的数万军人和工人徒手面对惊恐之极且拥有武装的蒯大富们

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635页。

会遭遇什么，挥泪的领袖也没有想过？在事先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命令徒手的人海对有枪的被围困者“强行缴械”还要“抄家”，能不出“意外”？如果对蒯不打招呼是偶然，何以聂韩谭王等其他造反派也一概被蒙在鼓里？领袖挥泪训斥之余煞有介事地当面告诉臣僚不要整蒯大富，何以他不久还是身陷囹圄？如果是工宣队员的“意外”牺牲“改写”了蒯大富和“井冈山”的历史，那么没有抵抗工宣队的其他四大造反派头头为何也遭到同样命运？

近年披露的一些内情更令人吃惊。如当年海军清华军宣队的朱勇说：七·二七当天清华的事他们也一无所知，次日即7·28才听说，并到清华参加了8341部队主导的占领。而这个海军军宣队本是早在2月13日就奉命进清华宣传制止派斗的，在校两个多月与两派都混得较熟。但4月23日“百日大武斗”开始后，他们却于25日奉命撤出清华，撤出后并未解散，而是集中驻于宣武区待命，并一直与校内两派人员有联系，明显是准备再入清华的。可是，七·二七当天的行动却对他们保密。把这些先前已经进校做过不少工作、熟悉情况、清华两派也都认识的人撂在一边，却另派三万陌生人闯关而入。这样决策究竟是为了什么？无怪乎采访者李仕林惊呼：“啊……，简直没想到，居然是这种情况。45年后，我才知道，太难以置信了。”¹其实另有资料显示，七·二七那天还是叫了几个海军军宣队的人“带路”，而且此前还派其中一人（凭过去的关系）到清华团派总部取来清华校园地图以布置行动。²但诡异的是这几人对包括朱勇在内的其他绝大多数军宣队同事守口如瓶，而取图者对给他地图的清华人也不吐一字。

聂元梓后来说：“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就不告诉我们呢？”³蒯大富和当时与他对立的孙怒涛也都认为这事如果通知了蒯，就不会发生惨案。但有趣的是他们都不认为这事是毛泽东的故意。蒯大富相信毛泽东的善意，孙怒涛如今其实是不信的。但他认为，毛对是否通知蒯大富的问题是疏忽了，他既不是存心通知也不是存心隐瞒，

¹李仕林：《朱勇访谈录》（待刊），

²见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41页。

³转引自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47页。

只是没过问这样的“细节”而已。但他又找材料证明毛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不仅决定发动、而且实际指挥了整个行动，甚至还“蹲在地上指点地图”，“哪个单位牵头，哪些单位配合，派多少工人参加，怎么进清华，现场哪些人指挥”都是由毛决定的。¹与这些具体的细节相比，是否对行动对象保密实际上关系到敌我判断，这难道还是“细节”吗？

事实上毛泽东完全明白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他“召见”时搪塞说：“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这叫什么话？招呼打了就是打了，没打就是没打，什么叫“间接打招呼”？谁都知道那时要打的不是什么毛主席希望停止武斗实现联合这种关于领袖“伟大战略部署”的招呼，而就是关于27日三万人进清华出于毛主席指令，要求清华配合这种“战术部署”的招呼。这样的招呼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的，有过吗？显然没有。但毛这样说，也表明他知道不好解释。没有这样的招呼，发生“误会”几乎不可避免。濒临绝境的四一四固然不会抵制绝处逢生的机会，校园本来就一统天下无人挑战、也早就厌恶武斗的韩爱晶或许也不会反应过敏，但这种逻辑能适用于当时的团派吗？

而我们从七·二五接见可以看出，起码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林彪麾下那几大军头都已把蒯大富看成敌人。毛泽东如无同感，难道他们能联合起来对毛设局？朱勇等人提供的信息也显示那时对七·二七行动的保密何等严格。其实，对那些被指为先于中共召开了反对派“九大”、窝藏各地“土匪”、甚至要联络各地“土匪”组织“黑司令部”以“控制全国的运动”的“造反”者，这样应对难道值得奇怪？当然，正如韦国清未必真信他手下编造的“反共救国团”领导“广西四·二二”之说一样，毛泽东与中央首长们也未必真信关于清华造反派的上述离奇说法。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按“英明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如今已经“轮到小将犯错误”了，他们不犯行吗？至于毛召见时对蒯大富的怜惜和挥泪，不能说完全没有一丝真情，但政治纸牌屋中毛唱白脸别人唱红脸的游戏我们见得还少吗？就在这场召见中毛不是还大讲刘少奇的病情、显示他亲自过问“救活”刘少奇吗？承蒙领袖如此关心的刘少奇此后还活了几天？他是在怎样的境遇中死去的？

¹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628-629页。

广西“处遗”披露的事实：

为什么“制止武斗”后杀人更多？

无论如何，经过七·二五接见和7·28“召见”，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广西文革和清华文革搭上了关系。但是广西造反派与清华造反派的遭遇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了。

前面提到7·28召见时毛泽东等人大骂广西四·二二杀人放火。这件事到了改革时期的1980年代已经有了官方的平反结论：“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¹炮击起火。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和广西联指却宣传广播说是‘广西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街道民房”。²当年7·28召见时林彪就此事骂四·二二是国民党：“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长征时的情形且不论，可笑的是现在事实证明：1968年在广西“用此计”的恰恰是林彪支持的共产党官员韦国清及其御林军。

而工宣队进清华宣传的“七·三布告”，也已经在广西被否定。1983年5月13日广西区党委发出《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并于5月20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该文件称：“当时中央发布布告是为了防止大规模武斗，但布告本身确实存在错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调动了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文件提出，即使为了安定团结在公开场合回避提七·三布告，也“应当把七·三布告的问题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并开展平反纠错和追究特别严重的大屠杀责任的工作。³事实上经中央指示后广西不久就不再“回避”，而是公开了这些“问题”，按官方的说法：“从此，压在人们头上长达十五年之久

¹即“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文革前和文革中广西当权派韦国清支持的所谓“老保”组织，“四·二二”的对立派，当时始终处于强势地位。

²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8年）第18册，287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³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第1册，3-5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的‘七·三布告’才得撤销，‘文革’中八万四千多冤魂才能得以平反昭雪”。¹

当时广西到底杀了多少人？《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1册“前言”说是“八万五千多人”。宋永毅先生曾根据这套资料中的各县死亡资料自行汇总统计，“大约是十五到十六万”。²参加“处遗”³的中央工作组成员、公安部干部晏乐斌说：“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八点九七万人”，“另外，全区失踪二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三万多人。”⁴而前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在他写给中央组织部的处遗申诉书中说是“20多万”，⁵这也是广西民间流传的说法。即便据1980年代“处遗”时官方宣布的各种“不完全统计”中最小的一个数字（指逐个核实后有名有姓有死亡情形可查、处遗中分别落实了政策的、精确到个位的数字），文革中广西也有84293人死于非命，其中“七·三布告”后的镇压就死了49272人，占文革非正常死亡的58.3%。如以革委会成立为分界，则革委会成立前（即包括广西四·二二这类造反派能够“作乱”的整个时期）死亡12457人，占14.7%；而革委会成立后（即剿灭造反派的过程中和造反派被消灭后）死亡71816人，占比高达85.3%。⁶另一个对比更为惊人：在这八万四千多死难者中，两派武斗死于“战场”者仅3312人，而其余96%的死亡即80981人都是战后屠杀“俘虏”、“贫下中农法院”屠杀“黑五类”以及在其他“非武斗情况下，被乱打死、逼死”的。

官方“处遗”文件称：“从以上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文革’十年期间（1）广西杀人多是在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2）杀人多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个别或集体加

¹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第7册，129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² 宋永毅：《血雨腥风中的广西文革真相：读十八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开放》2013年10月号，75-78页

³ 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简称，在广西当时这是个家喻户晓的语词。

⁴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

⁵ 袁家柯：《申诉书》，袁家家藏副本。

⁶ 按：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68年8月26日，时在《七·三布告》发布50多天后、也在对四·二二的“剿灭”结束后。有人提出：何以整个《七·三布告》后死的人占比只有60%不到，而内含的“革委会成立后”死亡占比却高达85%？其实细看处遗资料即可明白：这里所谓的“革委会成立后”并非仅指自治区革委会，各地、市、县分计的死亡数都是以当地革委会成立来分前后的。而各地市县革委会成立均在自治区革委会之前（第一个县级革委会成立于2月20日），而且（除桂林市等个别例外）均为韦国清支持的一派掌权，成立后即以剿灭当地四·二二为第一任务。到《七·三布告》发布时大部分地市县的剿灭已经完成。剿灭过程中各地县四·二二成员大量逃亡南宁、柳州、桂林等大城市。《七·三布告》发布后这些城市的四·二二也被剿灭，自治区革委会遂在“捷报”声中成立。所以，各地革委会成立后的死亡数比《七·三布告》发布后的死亡数更大是很自然的。

以杀害的。”¹

官方文献还指出：“《七·三布告》下达后的杀人，不仅数量多，而且很集中。如桂林地区文革期间死亡人数11918人，（其中）在《布告》后死亡的9087人，占死亡总数的90%左右。宾阳县由于县革委主任、（驻军）694师副师长王建勋等积极贯彻《七·三布告》，仅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十多天里，就打死逼死3681人，占该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人总数的90.34%。南宁市在贯彻《七·三布告》的很短时间内，仅围剿四·二二据点解放路等就打死1558人，为《七·三布告》前死亡人数261人的六倍。”²

发布《七·三布告》据说就是为了“制止武斗”，但事实是这个《布告》导致了广西流血成河，死了比《布告》之前多得的人。至今为止宣传的文革图景，都是说“造反派”如何造成乱世，尤其是“造反派的武斗”为文革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可是“处遗”资料以铁的事实表明：至少在广西，当权派和所谓“老保”镇压造反派，远比造反派野蛮和残暴得多（造反派当然也相当野蛮，这是我这个曾经的造反派群众从不想置疑的）。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不是死在造反派存在的“乱世”，而是死在造反派被剿灭的过程中和剿灭后造反派不复存在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中的双方“内战”，而是死于“有领导有计划的”专政机器对全无反抗能力的弱势者的大规模虐杀；不是死于党政在“造反”中瘫痪的“无政府状态”下，而是死于“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下。一句话，他们不是死于“造反派”之手，而是死于“维护秩序”和“重建秩序”的文革前军人和官员主导的政权——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名义上是“军、干、群三结合”政权，实际上无论广西还是全国各省，林彪垮台前绝大多数是军人主导，林彪垮台后“军政府”色彩明显弱化，文革前官员成为主导，但无论哪个时期，“群众组织”代表都只是跑龙套的，不要说造反派，就是如广西在镇压了四·二二之后进入革委会的“老保”组织功臣虽然算是飞黄

¹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第7册，127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²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第7册，128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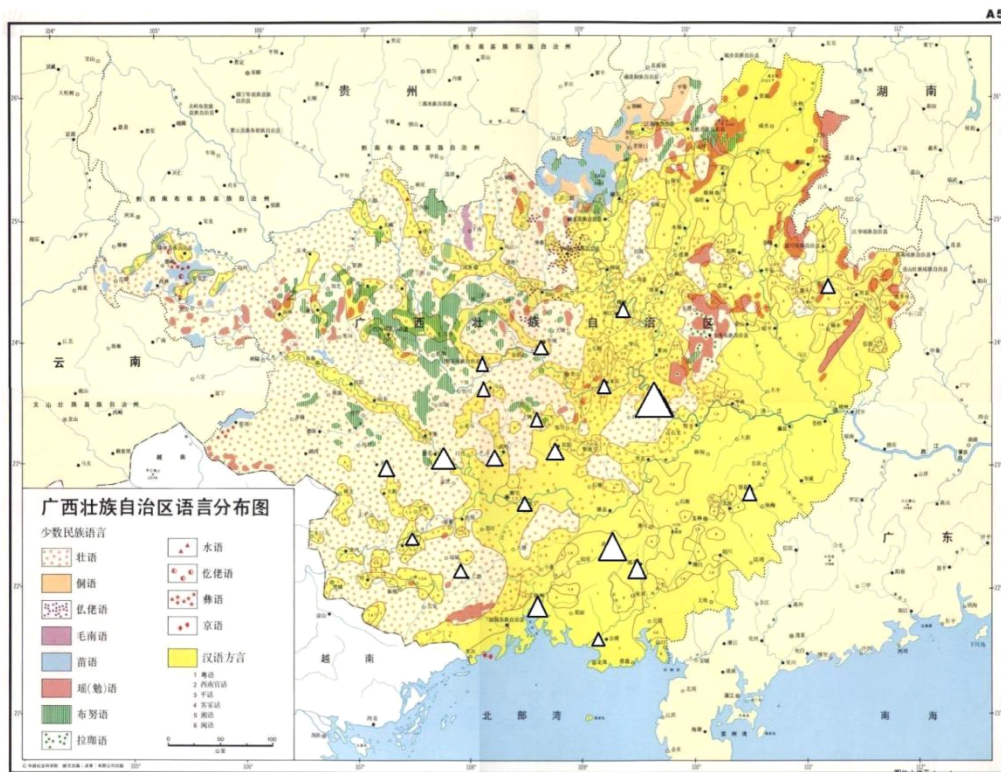
腾达了，也仍然是跑龙套而已。

当权派镇压造反派的标本

广西的事如今已经相当有名。我们不必寻找什么民间野史和回忆之类，1980年代广西官方编辑整理的处遗资料中，当年镇压四·二二时令人发指不忍卒读的残酷场面就连篇累牍堆积如山。诸如逼迫儿子当众亲手砍杀自己父亲（永福、都安、巴马等县）、残杀被害者后又强奸轮奸其妻女，奸后杀死并剜乳割阴、取肝而食，满门抄斩并洗劫房屋财产供凶手私分（武宣、蒙山、邕宁、融水、浦北等县）、杀人后变相贩卖其妻女勒索“改嫁费”（浦北、资源等地）等等。正如读过这些“处遗”材料的人形容的：“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杀父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¹请问在整个文革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造反派迫害走资派”何时、何地、有哪一次残暴、野蛮、血腥到如此程度？

处遗材料还证实，当时广西共有武宣、灵山、隆安、天等、浦北、上思、武鸣、崇左、马山、钦州、合浦、上林、邕宁、容县、宾阳、都安、忻城、钟山、来宾等19县和柳州市发生了杀人后挖食肝胆及人肉的骇人事件——而且很多地方是成批地、有规模地发生：隆安发生21起，灵山发生25起，武宣竟达75起。后来曾有人说这与广西少数民族的落后传统有关，并特地指武宣县70%人口为壮族。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笔者根据处遗资料中“吃人”事件的地点和规模在广西民族分布地图上作了标注。如下：（△表示地点，其大小表示吃人事件的数量）

¹ 《广西文革武斗惨况》，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4411668/2717/93/77/6_1.html



图中明显可以看出：广西民族分布的基本情况是东部主要为汉族，西部少数民族为主，由西至东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递减、汉族比例递增。而那些极端残忍野蛮的吃人事件全部发生在中、东部的汉壮混居地带，其中吃人案例次多的灵山和浦北、钦州、合浦、容县等地基本是汉族区，少数民族人口极少。而广西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大、经济社会也最不发达的西部（百色、河池两地区）反倒没有这种事。

进而论之，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民族分布是 1950 年代“民族识别”运动和后来的政策下形成的，实际上就文化、社会特征论，广西真正具有原生态民族特点的地方只有西部的百色、河池一带，中东部居民无论血缘上的“族源”如何，实际文化社会状态早已高度汉化。按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口径，广西只有 63 万左右的少数民族¹（其定义与我们现在不同，如白崇禧是穆斯林，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回族”，而只认为是信伊斯兰教的汉族，与信基督教的蒋介石也是汉族一样），基本都在前述的西部，文革中那里根本没有发生吃人事件，

¹ 据《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度广西统计年报》。按此为民国时期广西人口统计中少数民族（时称“特种民族”）最多的一次，还有几次人口统计的少数民族人数和比例更少。见卢露：《从桂省到壮乡：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壮族》，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59-60页。

而吃人案例最多的武宣按这一标准其实也是汉族（至少是汉文化）区。

显然，文革中广西的吃人惨剧与“民族文化”没什么相关性，那么它与什么相关？处遗资料明确显示：武宣县被吃者75人都是造反派四·二二成员、倾向四·二二观点的干部、群众，以及根本没有派别表现但却被指为造反派“社会基础”的“黑五类”及其家属，包括支持四·二二的2名党员、3名干部在内。而参与吃人的130人中，居然有党员91人、干部45人，非党非干的“群众”只有21人。吃人案例第三多的隆安县同样如此：参与吃人的41人中，党员36人，干部8人，“群众”只有2人；处遗时该县因吃人罪行被处分、判刑共21人，居然全部是党员，三人是干部。¹根据处遗—整党总结时统计，当时全广西共有近五万党员在“非武斗”状态下参与杀人，其中20875人是入党后杀人，9956人因杀人“有功”入党，17970人“与杀人有牵连”。根据“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处遗的结果是全广西共有2.5万党员被开除党籍。²

很明显，这种暴行的来源是二位一体：一是文革前就不断宣传并步步强化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观念及据此在社会上制造的以“出身”、“成分”好坏区分贵贱的现代种姓制度，在一定条件下走向极端就变成了“高种姓”对“低种姓”的虐杀。二是文革前当权派以地方驻军、各级武装部和官办民兵组织、基层政权为依托，组织、支持、发动所谓“老保”对触犯了他们的“造反派”实行报复性镇压。而这些造反派有的纯粹因为相信了某种上边灌输的说法而“奉旨造反”，有的则与过去积累的官民矛盾和体制积弊有关。尽管真正的低种姓贱民极少敢参加“造反”，造反派也尽可能回避这些人，但是他们的对手总是要把这两者归到一块，以便于镇压。

广西的暴行之残酷程度固然极端而罕见，但其基本行为逻辑却并不罕见。如闻名的湖南道县大屠杀，过去尽管其残暴已广为人知，但其原因却极少分析，甚至常常归之于“造反派杀人”。后来详情披露：其实恰恰相反，当时的情况是湖南省城造反派“湘江风雷”崛

¹黄家南：《血雨腥风的岁月——广西文革实录》，2014年自印，556-562页。（此书实为处遗档案18册的资料摘编）。

²宋永毅：《血雨腥风中的广西文革真相：读十八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开放》2013年10月号，75-78页。

起后，“老保”势力强大的湘南各县基层组织以武装部、官办民兵为支柱，为“防止湘江风雷下乡”，在镇压当地弱勢的造反派之余，对被指为造反派社会基础的“黑五类”和其他贱民“先发制人”实行斩草除根的屠杀，据说这可以阻止造反派势力蔓延。¹实际上，道县所在的湘南与广西接壤，广西北部很多地方的屠杀，如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之类，都是湘桂两地互相交流、互相取经的。

这种当权派假手所谓“老保”残害“造反派”的事件，当然不止发生在广西和湖南。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一书，收集了湖南道县大屠杀、内蒙古内人党大血案、广西四·二二被剿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广西宾阳惨案、北京大兴县惨案、云南沙甸事件等共七宗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其中除大兴惨案发生于尚未有“造反派”“保皇派”之分的1966年“红八月”、内人党与沙甸事件事涉民族关系外，其余四宗屠杀都是发生在1967-1968年的大乱期间，而且都是当权派屠杀“造反派”和被莫名其妙指为后者社会基础的“黑五类”。

广西有多“特别”？

兼论韦国清并非“中共桂系”与“壮王”

清华的情况当然与广西大有不同，死亡的规模也完全不可比，但耐人寻味的是不少人也指出：以“宣传《七·三布告》制止武斗”为由头进入清华的工宣队，在其掌权时期，清华的“非正常死亡”也比蒯大富得势时更多！

当然，广西的情况不仅与清华，与其他各省相比也有些特别之处。最明显的是广西文革前第一把手韦国清文革中成立革委会后仍然是第一把手。当时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都曾倒台过，全国类似韦国清这种情况的仅有河南的刘建勋和黑龙江的潘复生。²但是，

¹ 参见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

² 刘建勋文革之初已调离河南就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但由于继任的文敏生不受中央文革信任，又被中央派回河南去取代文并支持造反。潘复生则是从哈军工的一些“通天”人物中得到消息，出来领导“东北的新曙光”的。

刘潘二人都是得了内线消息第一时间出来支持当地造反派的弄潮儿，随着形势变化后来实际掌权的时间也不长，唯有韦国清从未支持过造反派，¹而且一直主政广西，他到广州和北京高升后，广西的权力也一直在他扶植的亲信手里，直到1983年中央为解决广西处遗问题专门调整自治区领导班子前，广西实际上一直在他的势力控制下。

不过，人们切莫因此以为韦国清是个中央奈何他不得的地方“诸侯”或“藩镇”，传说他因为与越南有特殊关系所以为中央所仰赖，更是没有道理。²韦国清是广西壮族人，而且是广西右江苏维埃红七军出身，有人因此认为他的执政有地方或民族或红七军背景，甚至称他为“邓小平（红七军领导人）嫡系”、“中共的桂系”、“广西王”或“壮王”。但实际上，韦国清在当时广西人心中主要是个“南下干部”，他治桂的最大特点恰恰在于一直以严厉打击“地方主义”、“民族主义”为动力取悦于中央。

我们现在知道，1949年政权更迭后一个大概率现象是：中央对广大“新区”的地方干部，包括地下党与地方游击队不信任，主要依靠中央派去占领该地的“大军”转业干部和下派外地籍干部（在华南新区就是人所共知的“南下干部”）来执掌权力，并与本地干部存在矛盾，以致发生“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在广东这种斗争影响尤为深远，以致文革中很多地方的“造反”都带有同情“地方主义”、反对“南下干部”的色彩。同属广州中央局（初期的华南局和后来的中南局）控制的广西地区也有这个问题，尽管不如广东明显。

但是，当时在“反对地方主义”问题上还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早年革命时从地方来到中央的当地籍干部一旦作为“钦差”被派回原籍去收拾“地方主义”，这些在中央镀过金的人整起一直在地方的干部群众来，往往比外地籍“南下干部”更狠更严酷。例如汕头地下党的吴南生抗战时到延安，1949年被派回广东，在反地方主义时他打击汕头地方干部就特别卖力，当时一些原东江纵队1946年北撤后又被中央派回来的人，对那些没有北撤

¹当然韦也不会“反潮流”地抵制“造反”。有资料提及1967年“一月夺权”时区党委在西园开会并向时在北京的韦国清请示对策，韦回复表示应支持“造反大军”夺权。这显然是韦在京了解“圣意”后的应景表态。当时旧“老保”已经失语，新的分野尚未出现，广西几乎只有“造反大军”一种声音，全国更是毛号召夺权的“一月风暴”席卷而来，在此一面倒的短暂特殊时间表态并无实际意义，何况也未公开。这与潘复生、刘建勋在社会尚有争议时就“站出来”公开支持造反派是完全不同的。

²与外国（哪怕是亲密的“兄弟国家”）有特殊关系，对中国高官尤其是封疆大吏而言恰恰是惹祸的大忌。

而是留下坚持斗争的东江系干部也是如此。

韦国清则是更为典型的例子。当年红七军从广西转战到中央苏区后命运多舛，两任军长一个（李明瑞）被冤杀一个（龚楚）叛逃。而韦国清属于到江西后转入中央系的幸运者，他对七军的不幸者并无同情心。原红七军首任军长张云逸组建的1949年后广西最初的党政班子在“反地方主义”中受到冲击后，韦国清于1955年作为副钦差空降广西，担任不久后接着空降的钦差刘建勋的副手收拾广西这个摊子，并且在刘走后全面掌管广西。韦国清到任的次年，广西就发生了统购统销下强征农民口粮导致规模性饿死人的1956年“平乐事件”，开后来三年“人祸”时期全国性大饥荒的先河。而广西领导层中对这种“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死活”的做法不满的人，则很快被刘、韦以“党内右派”、“地方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的由头加以清除。刘建勋到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在韦国清支持下进行高层“反右补课”，在全国性反右高潮已过的1958年，揪出了以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正如后来广西官方党史所说：“一个副省长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的头目’，省委八个部中六个部长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成员和右派分子，其中四个部长被开除党籍，一个部长受留党察看处分，另一个部长被撤销职务，在省委内部处分这么多领导干部，在党史上是罕见的，在全国各省市中也是绝无仅有的。”¹而这些人物的主要罪状正是为饿死的广西民众喊冤，犯了“地方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²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是非桂籍、是汉族乃至南下干部，但是因为对广西百姓心慈手软，居然就成了广西壮族人韦国清“反地方主义”的靶子！

有趣的是，尽管当初中央派去整“地方主义”的钦差们后来未必一直得宠（广东的陶铸等人文革中就失宠罹祸了），但当时去收拾广西的刘建勋、韦国清两人，在文革中却都是封疆大吏中鹤立鸡群的“不倒翁”。从某种意义上讲，韦国清可以说是“广西的斯大林”：

¹ 黄荣：《关于所谓“陈再励右派反党集团”的来龙去脉》，《广西党史》1999年第五期。

² 这些人中的王梦周等其实也是南下干部，而当时一些广西地下党游击队的人因1949年后就不受重用，又升不到省委高层“右派集团”的行列，因此当时又把桂籍干部黄荣、陈岸和区镇等人加进去，与上述诸人一起构成个“地方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文革后这两个“集团”均被平反。

他作为壮族人却依靠“南下干部”用中央集权主义打压壮族人，就如当年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以“比俄罗斯族更狂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来镇压格鲁吉亚同族一样。

关于壮族，韦国清的名言是：“壮族（与汉族相比）没有特点，依我看，这恰恰是壮族的特点，这正是壮族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地方”。据说他曾要求《刘三姐》主角的服装不要突出壮族特色，而要突出“劳动人民”特色。¹而今闻名天下的“壮族歌仙刘三姐”，本是源自广东汉族地区的民间传说，传入广西后于1950年代末被当时广西区党委文教书记、广东籍汉族干部伍晋南调集文化力量将其打造成广西壮族的“文化名片”。可是文革中韦国清狠整伍晋南，炮制“大毒草”《刘三姐》成为伍的大罪之一，整个文革十年中这“壮族歌仙”一直被“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国清封杀……。

壮族是否如韦所说的那样“没有特点”、是否“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而高度汉化，是个可以商榷的问题。笔者其实也觉得当年的“民族识别”多少有点照搬苏联民族理论“制造民族”之嫌。但问题在于韦国清的上述思想并非是要对各族都一视同仁，恰恰相反，他实际是对广西各族都一视同“不仁”。他绝非壮民族主义者，但也很难说是大汉族主义者，而只是个极权主义者。从1955年在广西任职以来，韦国清都极善于揣摩圣意，在人事上高度依靠外来干部和“南下干部”。广西地下党、边纵游击队出身的地方干部、“红七军老战士”乃至他故乡东兰凤山一带的壮族乡亲被他整得最厉害。在1958年“反对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整肃中，很多地方干部都被扣上“壮王”、“壮二王”（也叫“亲王”）的帽子。²而凤山“革老”（革命老人，即红七军老战士³）大都反韦，使该县成为四·二二在广西农村地区少有的根据地，文革中也被韦屠杀得最厉害——全县人口1.3%死于非命，死人比例为全广西之冠，其中“革老”就有149人遇害。⁴

¹ 蒙雄强：《壮族上将韦国清的点点滴滴》，《文史春秋》2010年第3期。

² 广西区党委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关于广西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查报告》（1983年6月18日），中共广西区党委桂发（1983）41号文件附录，载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办公室编：《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四册，（1987年4月）139页。

³ 当地又有“三老”之说，即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游击队员，总之也是参加过右江苏维埃运动的老人。

⁴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第5册，195-196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同为“东风老区”而与凤山毗邻的韦国清家乡东兰县尽管是联指占优势，当时并未成为“剿匪”重点，但韦政权镇压过后即成立“地下党问题专案组”，俗称“大案”组，由韦国清指定亲信刘重桂负责，除了在桂东南当年地下党游击队活动中心大肆迫害外，还上溯到苏维埃时期，专门“以东兰县为审查重点”，把该县的“革老”249人打成“叛徒、变节分子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右江地区很多老干部、老赤卫队员及其家属被污蔑为‘邓小平的徒子徒孙’、‘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后果极为严重”。¹韦国清的东兰壮族同乡兼红七军老战友韦祖珍文革中被中央调回广西与他搭档做第二把手，没两年就被韦国清借九·一三事件之机打成“林彪死党”，几乎整死。²韦国清的老首长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在苏区肃反中被冤杀，延安时期已平反并宣布为烈士，1949年后其在广西的家属因此很受尊敬，但文革时韦国清和广西当局在带头“批邓”³的同时又宣布李是反革命，“大有鞭尸扬灰之势”，家属也被整得“家散人亡”，⁴直到韦国清调离广西、文革结束，经邓小平直接过问，才恢复了历史的公正。

两个极端之间：造反派的共同命运

韦国清何以能成为“政治不倒翁”是另一个话题。这里要说的是：他在广西的作为并不是一个“土司”、“诸侯”的行为，反映的也不是什么地方或民族的“传统”，而就是一个成功揣摩圣意的跟风者、一个极权体制下地方官僚的无法无天，这在当时不能说没有代表

¹广西区党委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关于为广西地下党遭受迫害问题的平反报告》（1983年7月7日），中共广西区党委桂发（1983）45号文件附录，载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办公室编：《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四册，（1987年4月）151页。

²所谓“林彪死党”到底能否成立，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固然与林彪关系密切并与张春桥江青等人有矛盾，但是否与林共谋反毛，这都是历史上的疑问。但无论如何，黄吴等人至死都未能翻案。而韦祖珍文革后很快获平反，可见他与林系其实没什么瓜葛，其被整完全是因为他那个老乡的构陷。有趣的是，平生转战南北的韦祖珍只回桂工作了两年就被韦国清赶出广西幽禁他乡，临终仍要求落叶归根并终于葬在了广西，而主政广西20年的韦国清却化桑梓为怨府，最终选择了北京作为他安息之地。

³韦国清本人不仅在1967年1月出面具名“揭发”邓小平，1976年广西当局（其时韦已升迁，继任者为其提拔的安平生）还先于全国率先点名批邓、并建议中央在全国公开点名。1980年代的“否定文革”理论上是要否定造反派的，在广西“处遗”却主要是为造反派讨公正，这样的处遗能够实现，除了直接过问广西问题的胡耀邦、习仲勋、宋任穷、李锐等人可贵地坚持了实事求是外，也与广西当局这次跟风失算有关。

⁴李秉元：《沉痛悼念我的父亲李明瑞烈士》，<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64/145228/8953925.html>

性。只是由于韦国清从未失势，反对他的造反派广西四·二二也就从未像“井冈山”在清华那样一度得势。广西因此也成为当权派镇压造反派的一个极端典型。而在清华，文革初期工作队打倒了蒋南翔，毛泽东又打倒工作队并扶植蒯大富得以称霸清华园一年多。但是我们不妨设想：如果蒋南翔与工作队是一回事而且从未倒台（假如清华有个“韦国清”），蒯大富（假如他还会“跳出来”做清华的“四·二二”）的遭遇又会如何？

在清华，工作队扶植的“保爹保妈派”狠整过蒯大富，但他们很快就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干预下垮台了，后来的清华严格地说没有典型的“老保”。四一四是从“井冈山”中分裂出来的，当然，从“四一四思潮”重建文革前秩序（“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的想法看有点接近于“保”，但基本上还是被毛泽东看成造反派中的异端，后来和团派同归于尽都被毛泽东卸磨杀驴了。不过几年后（请注意：无需40年）回头看，老四的人还是比老团的人更能被体制接纳，但比他们两者都更能的，还是当年的“老保”。那么，假如“老保”始终没垮，清华园又会是什么样呢？蒯大富等人又会如何？

在当时的中国，清华与广西几乎是两个极端了：由于在皇城根下直接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扶植，“老保”早就没了踪影，造反派之得势天下第一，“百日大武斗”中蒯大富亟欲踏平四一四的气焰与广西“老保”踏平四·二二的声势一度近似——但仅仅是“一度”。别看毛泽东在“召见”时贬损四一四，但毛泽东其实是绝对不容蒯大富踏平四一四的（否则十个四一四也不可能“绝处逢生”！）。然而，毛泽东却非常乐见广西“联指”踏平“四·二二”。如果说在清华这一个极端中造反派的下场最终也还是比“老保”惨（请注意，我这里指的不是他们在邓小平时代的下场，而是指在毛泽东时代的下场），那么处在另一个极端的广西四·二二下场就不必言了。

事实上，无论韩爱晶、蒯大富们如何自命为“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并竭力与外地那些“不可靠”的、在野的、弱勢的造反派划清界限，最高层还是把他们归为了一类。从林彪那句“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足可见这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何等牢不可破！尽管蒯大富与广西四·二二毫不相干，蒯大富之曾经得宠于毛泽东

和韦国清始终恨四·二二入骨更是两个极端，但就是因为那个其实蒯大富与四·二二都并非主要角色的“清华、北航黑会”，他们还是最终被搞到一起了。其实，即使没有这个“黑会”，他们的命运也不会有多大不同——正如七·二七蒯大富“误判”了而韩爱晶并未误判，但他俩的命运也没有多大不同一样。

其实，这个“黑会”虽然被当局强加了莫须有的“重要性”，但当时各地造反派，无论曾经得势的还是从未得势的，都感到大难临头，纷纷来京鸣冤求救，以至于聚到了一起，这还是非常富于象征性的。据说当时北航红旗的祝春生在会上曾大骂那些与会的“不可靠的”外地造反派，说他们“反军”惹祸，还自夸我们北航红旗从来不“反军”，从来跟解放军保持一致，所以能够屹立不倒。而且据说康生看了这个发言记录还说讲得好——可是话音未落，祝春生还是进了黑牢，¹并没有比那些“反军”的家伙幸运多少。

上海并非例外：论王洪文何以持续受宠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其实按英明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1967年已经“轮到小将犯错误”了。只是由于武汉七二〇事件陈再道的意外犯上，毛泽东、江青又“额外”地宠了一次造反派。但是没过多久，“伟大战略部署”还是回到了原定的轨道。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利用造反派狠整刘少奇等他假想的政敌，主要是在北京的事。因此他宠幸北京造反派倒是比较特殊的。这一点就是上海也比不上。人们一般都以王洪文为造反派得宠的典型，其实，王洪文之所以能够在毛生前一直得宠，恰恰是因为他这个“造反派”非常另类，非常不典型。有人认为毛泽东抛弃蒯大富而久宠王洪文，是因为毛的意识形态重工人而轻知识分子。其实大不然。当时工人造反派比学生裁得更惨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上“一月风暴”以后，各地对造反派卸磨杀驴大都就是从“工总”之类的工人组织下手、而不是从学生组织开始的。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尤为典型。各地军方“支左”

¹戴维堤：《逝者如斯》之73《北航黑会》，乌有之乡网站。

后，收拾造反派大都是首先拿工人组织开刀，因为学生社会经历相对单纯，不易找到把柄，而工人，尤其工人中那些呼风唤雨者往往经历相对复杂，当局镇压较易找到借口。所以1967年后各地的“逆流”和“反逆流”常常是以军方首先把工人组织打成“反革命”，而学生造反派为之打抱不平，与军方发生冲突的模式演进的。

而王洪文能够持续得宠的主要原因，既不在于他是工人、也不在于他是造反派，更不在于他是“工人造反派”。他主要就是因为死保张春桥，而与张的得宠共始终。至于他反对刘少奇，甚至他反对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上海的“走资派”，则与他的“工人”身份¹一样，都不是他持续得宠的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身在上海的王洪文不仅对打倒刘少奇没什么贡献，甚至在上海的造反中他本来作用也不是最大的。他原是上棉十七厂的保卫干部，直到1966年11月间“造反”大潮形成、旧市委垮台已成定局时他才出来参与组织了“工总司”。不要说与北京早在这年初夏就奉旨发难的聂元梓和奉旨前就先忤逆了王光美的蒯大富相比，就是与上海最早起来造旧市委反的复旦“红革会”等学生组织相比，甚至与上海工人中先于他而造反的潘国平等人相比，王洪文的“造反功劳”也不是很大的。他崛起的奥秘就是在“安亭事件”中搭上了张春桥，而后王张投桃报李又搞掉了其他造反派——先是王洪文力保张春桥，镇压了炮打张氏的“红革会”等“老造反”，再是张春桥支持王洪文，血腥镇压了反王洪文的造反派“上柴联司”及上柴之外的“支联派”。

除这两个镇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镇压，即早在“一月革命”时就成为“上海特色”的镇压“经济主义”。尽管当时楞说“经济主义”是“走资派”煽动的，但如今真相大白：据起草人之一朱永嘉举证，作为“一月革命”最重要文献而名震天下的上海1967年1月8日那个“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本来正是“上海最大走资派”陈丕显签

¹ 王洪文其实是保卫干部，并非真正的工人。不过当时工人组织的头头很多都如此，如湖南的叶卫东、湖北的朱洪霞、广西的白鉴平等。其实就是传统的工人运动中，出头“代表”工人的往往也不是工人，如当年安源的李立三、江岸的施洋，只要真出于工人的推举授权，其工人代表的资格就不是问题。有趣的是文革中工人造反派被镇压时，不是工人的头头就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而受宠的王洪文自然没有此厄。

发的，陈也参与了造反派讨论《通告》的会议，张春桥却并未参与其事。后来毛夸奖《通告》，张却反过来诬陷陈丕显等“走资派”煽动“经济主义”，是他和造反派发出《通告》镇压了这股“歪风”。¹

其实谁都知道，所谓“经济主义”恰恰就是“造反”与老百姓（尤其是下层百姓）利益相关的部分，如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要求转正，下乡知青要求返城、荣复转退军人要求改善待遇等。但凡“造反”如果在为高层权争火中取栗之外还有百姓自己的利益诉求，那就是“经济主义”。反“经济主义”是典型的矛头向下，与“造走资派的反”完全相反。如果说厂保卫干部镇压临时工也叫造反，那与“贵胄红卫兵”殴打“狗崽子”的“造反”有何区别？为什么后者就叫做“老保”？而今天的“城管”抓小贩也可以叫“造反”吗？

北京的造反从未提出反“经济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也不指望他们提出，因为毛对他们的利用就是为对付刘少奇。上海则不同，反“经济主义”是“一月革命”的最醒目特征。没有张春桥抢下发明权的这个“创造”，“一月革命”是不可能有的后来的地位的。后来各地仿效上海的“夺权”基本都失败了，取代旧党政的“革命委员会”基本都是“军政府”或广西那样的“旧政府”。上海则不是，因为早在“反经济主义”时，基于百姓利益诉求的“造反”在那里已经消灭，而在其他地方都是要靠“军政府”或“旧政府”来消灭，才能建立“新秩序”的。

正是这三个镇压，而不是他先前的“造反”，决定了王洪文能够继续高升。

这里有争议的可能是“上柴联司”，今天它被研究者认为是个十分特殊的案例：它主要由草根群众与“17年受压制者”组成，而且反对本厂领导，这与当时“造反派”一般社会学特征相符。其对立派则多党团员与政工干部，更像是“保皇派”。但由于上层矛盾的特殊原因，上柴联司迟迟未卷入对上海市委的“造反”，很多成员还参加过市里的“保皇派”（即“赤卫队”），而其对立派则投靠工总司，更早参加了市里的“造反”。因此一些人把上柴联

¹金光耀：《朱永嘉与他的“文革”口述》，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210-211页。

司视为“保皇派”，王洪文后来镇压它时也是这么说的。¹其实，由于官场矛盾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当时的组织对一个或一级官府造反，而对另一个或另一级官府亲近，是常有的事，何况联司作为整体也并未参加过“赤卫队”，倒是参加过工总司（只不过参加较晚，而且主要联系的是工总司中与王洪文内讧的那些人），更重要的是，到1967年一月后，还有谁不造旧市委的反？笔者认为从群众性“造反”体现出对“17年”官僚体制不满这一点看，定义“造反派”应该主要看社会学特征和意识形态背景，而不是看对某个具体当权者的态度。对17年体制（有时未必是对整个体制，而是对自己在体制下的具体生存状态，比如受工作队的压制等）不满，但又接受当时官方意识形态、并以此为“造反”理由的，就是“造反派”。——如果对体制不满而且反对当时的意识形态，那在当时就算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而不是“造反派”了。

就此而言，上柴联司无疑属于造反派，而且比王洪文更典型。另外，“造反派”在当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是当时特殊形式的组织多元化的产物，大一统的官办组织无论持何种观点都不能说是“造反派”。从这一点看，1967年8月上海的“造反派”也应该是上柴联司，而不是王洪文及其工总司。

换言之，与其说王洪文与蒯大富类似，不如说“上柴联司”与广西四·二二更类似。1967年盛夏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武汉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镇压“三钢三新”与上海张春桥支持“工总司”镇压“联司”派，性质其实差不多。毛泽东当时对两者的态度截然相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陈再道这个莽汉冒犯龙威惊了圣驾，而张春桥又恰恰是毛的近臣。但是这样的截然相反造成政策混乱，近一年后才调整过来，于是武汉的“三钢三新”也被抛弃了——而在武汉以外，这一次不但“四·二二”的结局比上柴联司更惨，连“清华井冈山”也成了上柴联司的北京版——蒯大富看到数万工宣队进校时，顿时想到的恰恰就是工总司踏平上柴的情景！²

¹参见李逊：《砸“联司”大武斗之前——上海柴油机厂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形成及社会化过程》，<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262.html>

²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43页。

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把“清华井冈山”作为造反派一度受宠的极端，而“广西四·二二”作为造反派从未受宠的另一极端，那么清华这一极端其实比广西更特殊、更不普遍。北京以外的全国各地，甚至包括过去常被视为造反派持续受宠典型的上海在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其实都更接近于广西，而不是更接近于清华。

当然，即便是清华，最后也是在发展方向上（尽管不是在残酷程度上）向广西看齐了。

余论：

领袖利用了造反派，还是造反派利用了领袖？

回顾清华文革与广西文革的往事，令人叹息，更令人深思。作为两个极端，似乎再也没有比清华造反派与广西造反派差别更大的了。不说早先的受宠与否，直到七·三布告发布时，四·二二在广西正被别人“踏平”，而井冈山在清华还要“踏平”别人。但这么大的差别也没有避免他们很快还是殊途同归都被毛泽东镇压下去。而对于武传斌发起、北航主要接待的“黑会”而言，清华井冈山和广西四·二二其实都算不得主角，而且事实上两者并没有联系（两者都只是各自与武传斌有接触），但在中央首长嘴里，事情却变成了广西的“土匪”进京向清华的“黑司令部”“汇报”！更怪的是“黑会”的真正主角武传斌蒙受的后果也远没有清华人和广西人那么惨：武传斌后来三进三出囹圄，但时间都不长且始终未获刑。而清华老团获刑者累累，四·二二更是被浸在了血海里。很多人都说清华文革在全国文革中具有最突出的典型意义，其实，就造反派先受领袖利用后被领袖镇压而言，清华无疑是造反派被利用（后来也被镇压了，只是并非最惨）的典型，广西则是造反派被镇压（先前也曾利用过，只是价值不大¹）的典型。两者合起来倒是构成了中国文革最完整的典型图景——尤其是“造反派”由兴到亡整个生命历程的典型图景。

对于像广西四·二二那样的造反派被残酷镇压和野蛮屠杀，今天是怎么谴责也不过分

¹ 处遗资料表明，四·二二组织的形成与1967年春中央文革驻广西记者王荔奉命进行的工作有重要关系。但是不久上面就不再认为有这个必要，王荔被调，一走了之，留下四·二二任韦国清宰割了。

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四·二二就是正确的。“奉旨造反”结果却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固然可悲，但他们所奉之旨也很不人道，他们也喝过“狼奶”，得势起来也会很凶，就像清华井冈山得势时那样。广西四·二二作恶远比镇压者少，原因并不是他们的主张正确，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势的机会罢了。我一直认为，无论就17年极权体制下积累的官民矛盾，还是就“五十多天来”当权派首先发动“反右式文革”整老百姓（如工作队整蒯大富们、血统论下的贵胄打击贱民）造成的新民怨而言，文革中的群众“造反”形成如此规模，并不能仅仅用“奉旨”来解释，它是有社会土壤的，即使今天看来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是这也就如旧时的农民反官府一样，值得同情并不意味着它就不会得势作恶，更并不意味着它（如海外一些“人民文革”论者所言）就是“民主派”。把中国文革时的造反派混同于波兰的团结工会是完全不对的。在当时的中国，有社会土壤的造反仍然得“奉旨”发难，值得同情者也做了不少火中取栗的傻事和乌烟瘴气的坏事。不过，首先这只是“十年文革”中无数坏事的一小部分，其次这是领袖利用造反派作恶（利用完又镇压了他们），而不是造反派利用领袖作恶，这个基本事实是不能颠倒的。

现在看来，当时完全没有被利用（不是他们拒绝被利用，而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没想利用，而只想打压）的“造反”恐怕只有所谓上海一月革命中被张春桥王洪文等人镇压下去的“经济主义”造反——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所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底层情结”、他想为下层谋利益而打击官僚之类说法的荒诞。最底层的劳动者要求改善待遇，不仅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应该天经地义，“资本主义”也都还承认劳工运动合法嘛。即便当时的经济条件难以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也不能剥夺他们提出要求的权利吧！然而文革中无论局势多么混乱多么“无政府”，“经济主义”的诉求空间当局是一点不肯给。¹当局如此，主流造反派也与这类诉求划清界限。尤其是上海，当时不仅王洪文这种“另类造反派”，就连红革会这样的“典型造反派”也参与了镇压“经济主义”。广西也是如此，当时南宁有个要求回

¹ 文革中一度可以成立各种“群众组织”，但三种弱势者的组织是不被允许的：一是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等“三工”组织（他们会要求“转正”），二是下乡知青组织（他们会要求返城），三是荣复转退军人组织（他们对低劣的安置政策不满）。由于利益诉求明确，这三类群体参与“造反”非常积极，但他们的组织通常很快就被取缔。

城的下乡知青组织“青年近卫军”要求加入四·二二，但四·二二一些头头认为这些“没有户口的社会青年”不配成立组织，一直不承认他们。直到后来面临覆灭时，“青近”顽强抵抗，死亡惨重，在生死关头部分四·二二成员终于与之携手作困兽之斗。但即便如此，近年笔者做访谈时发现当年四·二二中一些大中学生和公职人员仍然不愿与“青近”为伍，尽管这时知青回城早已获得承认。

可见中国一般造反派（个别人可能例外）与“人民文革论”所说的“民主派”距离有多大。

揭示这些真相的意义重大。1980年代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本是对的，但当时的历史局限决定了这一“否定”仍然是基于当权派利益本位的立场，因此不仅“彻底否定”其实并不彻底，更重要的是也有失公正：那时的“否定文革”主要就是“否定”造反派，文革被描述成“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单一图景。以至于文革过去40多年后，一些年轻人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整‘走资派’，邓小平抬举‘走资派’肃清‘造反派’”。这个“事实判断”很少有人质疑，双方只是价值判断相反：有人说毛主席支持人民反官僚是对的，有人说老百姓犯上作乱不行，邓小平平定造反才对了。如果只是在这样的“事实”上讨论，那就永远不能搞清文革灾难的教训、也没法认识改革的意义。其实不仅是中国人，就是傅高义这样的外国学者也如此，他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仍然把迟群等人称为“造反派”，¹其实这些人恰恰是毛泽东派来镇压“造反派”的——但是迟群治下被整死的人却要比“造反派”蒯大富治下更多。

文革中当然有“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一幕，但绝非仅仅有这一幕，而且如果我们承认“十年文革”之说，那么这一幕其实非常短暂。重要的是几个被忽视的“真相”：“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那时镇压他们的人往往更野蛮，总的来说在那十年中，“造反派”的受难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而就造反派本身来说，他们受难最惨的主要是在毛泽东时代，而非邓小平时代。

¹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121页。

另一方面，“走资派”（老干部）长期受大难、改革后才解厄者固然不少，但其中受“造反派迫害”只是一瞬，90%的时间他们是受的“常规党内迫害”，与根本没有造反派之说的苏联克格勃黑狱没什么本质区别。“彭陆罗杨”受难时，“造反派”还远没有问世，而王光美一直被关押到改革前夕，难道那是蒯大富关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名实”分离，说的与做的相反。正如今天几乎100%的当年“右派”都已平反，但“反右”仍被认为“必要”一样，当年毛泽东把95%的“造反”者都收拾了，理论上“造反”却仍被说成是对的。而与毛生前对造反派的残酷镇压相比，邓小平时代虽然理论上整体否定了造反运动，并清理了一些“三种人”。但不仅这种处理无法与毛泽东的镇压相比，而且事实上，大量造反派的冤案却是在邓时代得到纠正的。关于文革，无论是官式的“彻底否定”还是“毛左”的“毛主席支持民众反官僚”论都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把“造反派”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事绝大多数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而不是在邓小平时代。

而真正带有“人民文革”色彩的造反，如前述的“经济主义”造反，毛泽东时代不但官府镇压之，主流“造反派”也往往排斥之，反倒是在改革初期，很多这类“造反”（典型的就1979年前后的知青回城抗争）取得了成功！

邓小平时代以清理“三种人”的名义把残留在党政机关中的一些曾经的造反派予以驱逐，一些人还被判了刑。但其实到1976年时仍然得势的“造反派”人士不但已经极少，而且大都像王洪文那样以镇压其他造反派的方式交过“投名状”，实际上已不再是造反派而只是文革新贵。这场“清理”对“造反派”的打击其实远不如毛泽东时代的镇压。更有不少如蒯大富这样的人其实在毛泽东生前已经坐牢很久，但那时盛行的是不讲任何理由和程序的随意关押、无限期的黑牢；即使放出来也是“黑五类”式的贱民，无法拥有正常生活。邓小平时代开始讲“法治”，把他们正式审判定罪，判了刑期。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那种审判实际还是“政治挂帅”，“法治”水平很低，也未必公正，但由于此前的羁押折抵刑期，他们中不少人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坐牢的时间还长于邓小平时代。出狱后尽管也受到歧视，

但程度比毛泽东时代对贱民的歧视差得远，他们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生活。

更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时代虽然理论上彻底否定了在毛泽东时代受到理论肯定的“造反派”，实际上却有很多毛泽东时代镇压造反派的冤案，是在邓小平时代被平反的。这实在是历史的吊诡！例如改革初年获得平反的最出名的几个文革中遇害的异议人士（有的平反后被宣布为烈士），当年他们其实并非同一立场，其中因反对打倒刘少奇而被害的张志新自然不是造反派（她应该算“保守派”），但遇罗克（因编辑造反派的《中学文革报》反对保皇派的“血统论”而遇害）、李九莲、钟海源（都在军人政权镇压造反派时遇害）等多数人其实都属于造反派。还有那些活着的人：上海的胡守钧、陈卜昌、侯美度、全向东、邱励欧，武汉的鲁礼安、湖南的杨曦光（即后来名满天下的杨小凯）、广西的钱文俊等，他们不仅是造反派，而且多数还是造反派中最激进者，他们都是毛泽东时代坐大牢、邓小平时代获平反的。

那时冤死的人除了“贱民”以外，肯定以造反派居多——至少比“走资派”和“保皇派”多，这些被平反者自然也是如此。典型的是作者的家乡广西等地，文革中对“造反派”成千上万地大举屠杀，可谓惨绝人寰。那也是邓小平时代被平反、得以恢复公道的。1983-87年间“处遗”中被惩罚的一些杀人者按当时的政治口径都被指为“造反派”，其实他们固然罪有应得，但说他们是“造反派”就与事实刚好相反了——他们是文革前当权派的御林军。而大量的广西“造反派”恰恰是在邓小平时代从地狱回到人间的。

因此就不难理解，尽管今天有不少不懂历史的年轻人从“造反派反官僚”的角度同情文革，但实际上在1970-80年代之交，走出文革、实行改革是包括绝大多数前“造反派”和“走资派”在内的几乎所有国人的共识。只是当时改革主导者是复出的当权派（文革中所谓的“走资派”），按他们的意图进行的改革固然基本上符合上述共识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偏见和扭曲还是不少，改革之路远比当时人们想的复杂和坎坷，对文革的反思自然也是如此。这也就是孙怒涛先生主编此书的意义所在。■

【随 笔】

印象科隆

——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阿陀（美）

—
为期三天的科隆大学“纪念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地方文革史新观察”国际学术研讨会昨天圆满结束。主办方，德国科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文浩教授领衔(包括博士生)的团队为会议成功举行做了大量的工作，充分体现了“德国效率”。

出席会议共约三十多人：瑞典、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日本等国家的研究文革的著名学者大都躬逢盛会，连同他们所带的博士生，几占会场的半壁江山。值得一提的，维也纳大学魏格林教授是主持人文浩教授等人的老师，和文浩的学生三代同堂，魏教授堪称师祖。

中国来的主要是对各省市地方文革史研有专精的学者(多自大学或研究机构,他们的研究和会议发言并不仅限于文革)。此外还有中、美等地个别民间学者被邀请参加会议。

此次会议的主旨是推动中国地方文革史的(材料)研究交流工作，所以北京《记忆》杂志主编吴迪教授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方文革史交流网》主编吴一庆教授的出席，对会议的成功举行及发挥影响至关重要。

会议议题主要围绕材料的发掘分析和方法论方面探讨，只有学术切磋，没有左右争论，也堪称务实和谐。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在一个特殊的地方，为了抢救随着文革一代离去而即将被埋葬的一个民族历史(也是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五湖四海不同国籍地域的有心人

齐聚一堂，也算是共襄义举。

值得宽慰的是，有关方面这次在处理正常学术交流方面展现了克制和理性。所有被邀请的人都能顺利到会。

三天会议，日夜连轴，严肃热烈，尤其最后一天的发言颇启人深思：

加大吴一庆教授谈了文革前夜政治革命及文化革命两条(各有独立一面)并行线交汇的背景。北大印红标教授讲北京南下红卫兵对各地运动的影响，实际点出了红卫兵是怎样以手奉圣旨天兵天将的身份冲破各地省市的权力藩篱，打开群众运动局面的。

随后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发言，分析了六八年七月北航黑会，“7·25 接见”及“工宣队攻进清华……毛结束群众造反运动的“缴械”背景。

最后发言的是位老先生，在青年博士小崔的协助下投影图示了大量文字档案资料，证明文革发动者原始意图并非通识的重点“打倒走资派”，两个拳头也并非一重一轻，根本就是要通过这场运动解决“走资派”和“右派”两个问题，甚至可以说后者才是真正的重点……

二

德国是我童年梦中的黑森林，是那美丽而又神秘的格林童话故乡。

发起组织的德国人及其它西方学者，可说人人都在中国生活学习工作过(有人甚至下乡扶贫)，接触中感到他/她们都对中国人民有非常真诚的感情。

一个学者如果还能保有童话的情怀，他/她治史就一定能问心无愧。正如印红标先生在我的五十周年纪念册的题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会议期间除了和魏格林、徐海亮等老一辈文革研究者有推心置腹的交流，我还和各国博士生有相当深入的接触。临别甚至和(日本及北大的)双博士生新野聊到午夜。小伙子感叹为什么我们两代人之间竟一无障碍？我说因为我们这里都是“格林童话人”，而童话，就是让人不说假话。

科隆是一千年古城，欧洲最高最壮观的双塔教堂固然令我叹为观止，但印象更深刻的

是金雁教授指给我看的镶钳在一个门口路面的三枚黄晶晶的铜片，某年某月某日有三名犹太人被杀于此……没有任何说明，只是默默守护，默默见证。

中国人我，无语。

三

今夜，在无声的大地上，多少双眼睛在仰望星空。“50”——只有欧洲，一颗刻着数码的流星匆匆掠过……

你可能看不懂他们

太重专业，

你可能不满意他们

出了国还要嘴巴把关。

尽管他们拒绝谎话，

却也并非畅所欲言。

请原谅这群勇敢的“犬儒”吧，

相信总有一天，

我们不必再来科隆，

也会有属于自己的

精神家园。■

2016年4月25日

独立学者阿陀草于德国机场

【德国之声】

文革五十年：斗争还在继续

《德国之声》专题报道

文革发动的五十年后，德国知名文革研究者文浩（Felix Wemheuer）认为，中国社会的相关争论依旧非常激烈。

1966年夏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五十年后，中国社会依然还未就如何评价毛泽东发动的这场群众运动取得共识。1981年，中国共产党曾试以“十年动乱”，“为党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评语，为文革盖棺定论。但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互联网上，赞成派与否定派之间的争论依然针锋相对，非常激烈，依其所持看法，主要可分为四个思潮：

1. 流行很广的观点是：文化大革命持续性破坏了中国（儒家）文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日中国的贪婪腐败、道德败坏风气，其根源也在于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文明断层”，因为毛泽东号召工人、学生起来造权威的反。当年“疯狂”的例子，譬如有1966年8月中学生活活打死老师、中国的部分文化遗产被砸毁等。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才发动文革的，他别有用心地利用了年轻人，这样的历史决不能重演，因此，维护稳定对中国具有核心意义。

2. 一派很具影响力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作为非计划中的副作用，党组织曾一度陷入瘫痪，使许多人醒悟，开始批判性思考。在“人民文革”（1966年秋至1967年1月）期间，在政治上、社会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在短时期内得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最后，在失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体中，形成了批判性思潮，他们一开始是在地下讨论自由理念，对党的官僚统治提出质疑。1979年“北京之春”、1989年学生运动的思想起源就在于此。

3. 新毛派则认为，中国 1978 年后的发展证实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毛泽东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与腐败的“官僚阶级”作斗争，以防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他们深感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失败，这些“官僚阶级”时至今日一直在掠夺工农。新毛派中的极端者认为，发动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动员人民反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4. 由学界主导的“新左派”并不希望重返毛泽东时代，不过他们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导致知识分子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没有批判能力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应该批判性地看待并重新采纳当时一些积极正面的做法，如工人参与管理（比如鞍钢宪法）、民众的高度政治化以及卫生政策和教育政策的社会公益取向等。

党的领导层以及部分民众却以维稳为名，不希望就文化大革命展开公开讨论。对文革的正面回忆受到压制，但自认为是文革受害者的群体也不应自由发表言论。不仅是当时那些遭受迫害的精英感觉受到了不公待遇，就是许多当年响应毛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左派人士在 1968/69 年军队接管维持秩序后也锒铛入狱。今天若就文革展开公开讨论，可能又会重新揭开老的伤疤。

1966 到 1968 年间的文革之所以很具爆炸力，主要是因为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与民众中的社会冲突结合了起来。就在中央主席毛泽东针对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展斗争时，工厂、院校的群众分裂为敌对的派别，誓不两立，互相争斗，有些甚至不惜动用武器。纵观今日互联网上老文革及新文革赞成派和反对派之间的论战，不难想象，他们很可能会大打出手。其口诛笔伐对方的气势，丝毫不亚于当年的红卫兵。

参与论战的，不再光是那些时代见证人继续他们往昔的争论，而且还有对党持批评态度的自由派和左派人士。这些人借助过去，对当今的体制提出批评。其中大部分人都对文革的反官僚主义想法表示认可，只有小部分人对当年虐待老师、破坏文物进行辩护。较新

的一个现象是，新毛派主要是在年轻人、在大学生中得到很大反响，而不仅仅只是在被解雇的国企工人、昔日的造反派和退休的老干部中受到欢迎。

不过，对毛泽东最后一次革命的意义讨论，其激烈程度表明，他1966年凭“造反有理”这句口号所释放的幽灵，还远未得到安宁。其核心问题，即“官僚阶级”不受监督地统治整个社会这个问题，迄今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社会要想认真反省思考过去，就避免不了也要谈及当代的种种不公。■

【德国之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西方的新左派

《德国之声》专访

德国科隆大学汉学家 Felix Wemheuer (文浩) 教授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摧残，但在50年前，文革在西方也有很多热衷的追随者。Felix Wemheuer (中文名：文浩) 是德国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学教授，著有一本2009年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他介绍了其原委。

德国之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不光在中国，就是在德国也有许多高中生、大学生兜里揣着被称为“红宝书”、“毛圣经”的《毛主席语录》。毛的名言，用花体印在信仰社会主义的学生组织散发的传单上，也被议会外反对党（APO）组织的游行队伍此起彼伏地高呼。德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年轻一代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中国的文革？热衷于毛泽东？

文浩：根本的前提条件是，当时的西方社会已存在接纳相应事物的意愿。当时许多西欧国家陷入一场意义危机，许多年轻人，许多知识分子，还有工人，开始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提出质疑。越南战争在此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美国一边在越南犯下滔天的战争罪行，

一边却以西方道德权威自居，使人心生疑问。



但就当时的另一阵营而言，苏联在很多人心目中也是名声扫地。自从苏联镇压了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起义后，西方左派就开始寻找其它的革命模式、革命样板，而自六十年代中开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恰好迎合了左派的这种寻求。

德国之声：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信息和想象是怎么传播到欧洲的？那时不像今天这样，还没有互联网，就连常驻中国的记者站，西方媒体都没有。

文浩：很重要的一条渠道是西方寻访革命的作者，就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斯诺在三十年代访问过延安，他当时撰写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六十年代中期又大量再版发行。斯诺在书中将中国共产党描述为有别于苏联的，植根民间、民主的另一类型。瑞典作家扬·米尔达（Jan Myrdal）的《来自中国乡村的报道》（*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一书也发挥了很大影响。

不过，中国政府所开展的宣传工作也不容轻视。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就推出一系列针对国外读者编辑撰写的期刊，并从六十年代开始发行各种语言的版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说，那是生硬笨拙的政治宣传，但我从对那个时代亲历者的访谈中发现，当时德国许多左派知识分子至少在一开始也是对那些宣传很当真的，特别是所谓的K组，即继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后，于七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在西德很多地方成立的各种共产主义的党派，对中国这些官方刊物尤其认同，并将其内容视为非常重要的参考来源。

德国之声：文化大革命给人带来的痛苦、给国家带来的破坏，当时西方知道吗？

文浩：1966年夏，教师被殴打，文物被破坏时，德国《镜报》以及其它一些新闻媒体还是对其进行过报道的。但对1968和1969年恢复秩序后军队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人们肯定是知之甚少的。中国国内对此也没怎么报道，因为当时的清理做法是经典的

斯大林式做法，任意逮捕、处决对手，或将其关进劳改营。

较新的研究表明，文革非正常死亡者数总共在 120 万到 160 万人之间，其中大部分受害案件发生在非造反、非武斗期。1966 年夏的红卫兵造反，可能致使一万人丧生；随后的武斗，夺去了几万人的生命；但后来清队运动的受害者人数，却是以数十万计的。

德国之声：假如西方左派对中国发生的事件了解更多的话，他们会有另外的反应吗？

文浩：对此你只能猜测了，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在新左派中，已形成一种理性化看待暴力的观点，其论据之一就是背负纳粹历史且身为“帝国主义”国家之民的德国人，无权给中国的同志上“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的道德课。譬如有些 K 组（共产主义的党派）甚至在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 1978 年至 1979 年被推翻后还在为其辩护，不过另一些很早就与红色高棉政权划清界限了。

德国之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成为西方 1968 年学生运动的榜样呢？西方这场运动在哪些方面和中国的文革挂上钩了呢？

文浩：中国的文革在一开始是反对教师、反对学术权威，在第二阶段即从 1966 年秋开始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在这些方面，西方很多人看到了可类比之处，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当时人们对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感觉也是过于官僚，过于改良主义。这两个党的许多党员和拥护者发现：哟，我们所处的情况，和中国这些闹革命的年轻人很像呀！

除此之外，中国的第三世界思想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依照该思想，第三世界正发生着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中国早在文革前就非常积极地把自己视为第三世界国家摆脱半殖民地命运的典范而加以推广传播，譬如接收非洲游击队员到中国培训，向非洲国家派出顾问等，并把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当作普遍适用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成功范例而大为宣传。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文化大革命也被视为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非仅仅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运动。

这一点，甚至也得到德国保守界和反共界的青睐，因为它指出一条走出两极以至多极世界的途径，为与中国联手共同对付苏联提供了可能性。甚至像弗兰茨·约瑟夫·斯特劳

斯 (Franz-Josef Strauß) 这样的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也对毛泽东表以赞扬之词。

德国之声：中国的文革和西欧 1968 年的学生运动在进行过程方面有相似之处吗？

文浩：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即从 1966 年夏至 1967 年春，是所谓的人民文革阶段，那时有不少时候是人民即兴向既有体制造反。1968 年德国和法国的大学生反权威运动，情况就挺类似。中国后来的情况变得太乱，毛泽东便尝试先用军队，然后再借助党的力量，恢复秩序。直至 1976 年过世，他一直都在致力于修复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

欧洲也在 1968 年底，1969 年初反权威阶段趋向尾声时，出现了学生运动其实失败了，还是需要较为稳固的党组织的观点。西方的积极运动者对文革的这一转折好像并没有怎么意识到，就是在相应的转折过一段时间后也在西方出现时，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意大利左翼共产者就是一个实例，特别是其中的“宣言”小组 (il manifesto)。该小组 1969 年的时候还在借鉴文化大革命的即兴性、反权威性，虽然这一做法当时在中国已经被叫停了。

德国之声：如果把文革时期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与今日中国对西方的影响相比较的话，您有什么看法？

文浩：毛泽东想天翻地覆地改变世界，但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一个强大的中国融入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融入已有的权力架构。但中国今天的“软实力”却远远比不上 1968 年。今天大概只有极少数德国人会说，在体制方面，德国应该向中国看齐。■

【德国之声】

德国汉学家回忆文革中的北大

《德国之声》专访

维也纳大学汉学家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魏格林) 教授



真正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外国人为数不多，德国汉学家魏格林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她在文革末期曾经在北大读书，经历了文革的尾声和最后终结。

（德国之声中文网）谈起 1975 年第一次中国之行的经历，维也纳大学汉学家魏格林教授（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将其比作“登月之旅”。因为这是对一个几乎完全未知世界的探索，当时的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仍然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而文化

大革命也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

在那之前，中国的文革就已经引起了这位年轻德国女性的关注。70年代初，还是中学生的她曾经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传出消息，尼克松政府和北京的领导层建立了外交联系。有关中国以及所谓“乒乓外交”的报道充斥着美国报纸。对于文革也有不少报道，但是角度极为不同。部分报纸以及学生运动组织将文革称作指引道路的运动；而保守派的报纸则揭露了文革中所出现的骇人听闻的残暴事件。这引起了魏格林的好奇心，她当即决定要学中文，因为不知道该相信哪一派媒体的报道，所以她要去看中国自己亲眼看一看。

文革的尾声

与 14 名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学生一道，魏格林在 1975 年 9 月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1976 年，在通过语言考试之后，魏格林从原先的语言学校转入北京大学就读，因为她希望多与中国人接触。在北大宿舍里，有一位中国女生和她是室友。“按照当时的习惯，外国学生总是要和中国学生一起居住的”，她回忆道。

魏格林和同行的德国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直接面对文化大革命。其实当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在报纸和宣传板上，

仍然随处可见否认文革结束、呼吁发起新的文革的言论。“当时的北京大学政治气氛十分浓重”，魏格林回忆道，“我的中国同学们也在不断地写大字报，尽管他们不是发自内心的。是上面对学生下达的指示，要求所有人都要写这个或者那个题目。”

最初魏格林感觉，自己和中国教授以及同学之间的交往是坦诚的。但问题逐渐浮现出来。“当我们和老师交谈之后，很快就发现，有些谈话内容是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的。”魏格林讲述道。有些内容其实也并非批评性言论。在学生宿舍里，魏格林还发现自己的中国室友常常在深夜里哭泣。当魏格林问她为什么哭时，这名女生说是学业上遇到了问题。直到后来文革结束之后，魏格林才得知真正的原因：这位同学的母亲饿死了，她在为之伤心的同时还担心自己年幼的弟弟也会饿死。

毛泽东的去世

在文革浩劫中，不断地有新的政治运动掀起，而且这些运动的思想部分是互相矛盾的。然而造成政治混乱的责任既没有记在“四人帮”的账上，也没有人去责备毛泽东。“当时的中国学生和我们都意识到，中共高层内部存在激烈的斗争，谁也不清楚未来应该往什么方向走。”魏格林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成为一个巨大的转折：“在那之前在我看来对毛泽东持批评态度的人，也突然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她回忆道，她和其他的德国留学生还扎了一个花圈，送到学校的悼念堂去。“我们的导师——其实我们对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略有耳闻——想要对我们表示感谢，但却忍不住哭了起来。”魏格林表示，她坚信那些都是真诚的眼泪，“这是出于绝望的眼泪，因为对于他来说，从此再也不会会有任何一个这样让人绝对信任的领袖了。”

最后的肖邦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传达这个消息的那一天早晨，北大所有的外国留学生都被送上了大巴车，带到了郊外。在京城外的一个人民公社，这些外国学生被要求下车，然后在一片稻田里收割。他们并不知道“四人帮”被捕的消息。直到晚上，累得精疲力尽的年轻人被送回了北大校园。“当车在我们宿舍楼门前停下来时，我们突然听到肖邦的音乐从扩音喇叭中传来，大家都在街上跳舞。”魏格林回忆道，“那天的校园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中。“经历了十年的混乱、暴力之后，文化大革命就这样结束了，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对于文革究竟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我带着明确的答案回到了家乡。”魏格林总结道。“在1976年10月之后，我的朋友、相识还有教授以最直接了当的方式向我所讲述的一切，包括文革中人与人之间的冲击和斗争，至今都给我对文革的见解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文中的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简讯】

德国科隆大学 2016 年 4 月 召开“纪念文革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韦陀

2016年4月21日至24日，德国科隆大学（University of Cologne）东亚研究中心在科隆大学召开了题为“Conference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Provincial and Local Histories”（“纪念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地方文革史新观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科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Felix Wemheuer 教授主持，由著名的文革史学家 Michael Schoenhals 教授做《国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二零一六年夏季的形势》的主题讲演。



（科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文浩教授主持会议 阿陀摄影）

会议历时三天，与会学者来自中国、德国、瑞典、奥地利、法国、加拿大、美国、日本及中国香港等地。学者提交论文有：

Andrew Walder (Stanford University):

National Patterns of Conflict, 1966–1969: An Overview

Ylva Mondschein (University of Munich):

Armed Struggle in the Mountains of South and Central Shandong — The Ca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s in Linyi Prefecture

Wang Xia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Mao's Revolution and Ethno-Religious Conflicts: The Muslim Uprising in Southern Yunnan (1971-1975)

Jaehwan Lim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Rectification Campaign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1975

Shinichi Tanigawa (Kobe University):

Demobilization, the Form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Escalation of Repressive Violence: Shaanxi, 1967-1971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University of Vienna):

中国大陆的记忆文化：以卞仲耘之死为例

NITTA Junichi (Beijing University):

老干部与文化大革命后的平反冤假错案

Yiching Wu (University of Toronto):

梳辫子的当代史涵义：文革发源和发动再探

Xiaohong Planes (INALCO, Paris)

“身份政治”的滥觞：文革时期中共高层的家族与派系集团

Dong Guoqiang (Nanjing University):

从“夺权”到“军管”：安徽文革运动初探

Wu Di (China Film/Art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内蒙文革中的“挖肃”运动——原因、过程及影响

Tan Jialuo (Chicago USA, Folk scholar):

广东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升沉轨迹

Jin Guangyao (Fudan University):

上海“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研究

Xu Hailiang (School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武汉：1967年之春——分歧的由来与发展

Yu Ruxin (Hong Kong China, Folk scholar):

河北“三支两军”述略

Liu Jianhua (Qing Dao China, Folk scholar):

青岛“八·二五”事件

Zhang Yeshang (Bingzhou Xueyuan):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述论

Cui Jinke (University of Vienna):

文化革命中的地方派性政治——山东和山西：1966-1981

Miao Chi Chi Miao (University of Lorraine) presenting He Shu:

他们为什么成为造反派——重庆造反派百人分析

Yin Hongbiao (Beijing University):

北京的红卫兵大串连与地方文革

Xiaohong Planes (INALCO, Paris):

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女和早期红卫兵

Huang Yanmin (Beijing Shifan Daxue):

“破四旧”运动中的批斗、抄家、遣返——以济南为中心的考察

Sun Yancheng (Qing Dao China, Folk scholar):

青海“二·二三”事件

ROUNDTABLE | UNIVERSITY OF COLOGNE

GLOBAL SOUTH STUDIES CENTER COLOGNE

EXCELLENT
Funded through the German Excellence Initiative

University of Cologne

ORGANIZED BY
Global South Studies Center
Prof. Felix Wemheuer

VENUE
University of Cologne
Seminargebäude (106), Raum 26,
Universitätsstraße 37
50931 Cologne

CONTACT
felix.wemheuer@uni-koeln.de
(no registration necess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URTHER INFORMATION
gssc.uni-koeln.de

April 22, 2016, 19.00-21.30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Legacies and Continuities
文革五十周年

Speakers: Andrew Walder (Stanford University), Barbara Mittler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and Chinese scholars

这是第一个以地方文革史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会议邀请的中国学者大体上分为三类，一类是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就职的专家，二是离开教学或研究机构的退休学者，三是民间的独立研究者。从中西学者提交的论文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中国学者以史料的丰富和分析的深入见长，西方学者以视野的开阔和理论的建构取胜。总的来说，这个会议疏离现实政治，注重学术性，会议表面影响不大，但就文革地方历史的研究而言，意义深远。其首创之功，促推之诚，将载入史册。■

【资料】

德国科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简况

友珏 文/图



科隆位于德国北威州，是德国第四大城市，自然风景优美，人文古迹众多，以哥特式建筑的典范——科隆大教堂闻名于世。莱茵河纵穿其中，灌注以科隆市平和包容的独特气质。坐落在莱茵河西岸的老城区的科隆大学建于1388年，仅比历史最悠久的海德堡大学年轻两岁，而规模也仅次于柏林自由大学，为德国11所精英大学之一。该校文理兼备，不设工科，在人文社科领域拥有优良的学术声誉。

科隆大学于1960年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以满洲史研究为世瞩目，满洲史研究专家瓦尔特·富赫斯教授(Prof. Walter Fuchs)和嵇穆教授(Prof. Martin Gimm)先后就职于此。德国人很早就通过传教士认识了满文及其重要意义，并在国际满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汤若望即为显例，汤氏的故乡便是神圣罗马帝国科隆城。90年代以后，科隆大学的汉学系开始逐步发展壮大，设立了3个教授职位，期间沙尔平教授(Prof. Thomas Scharping)曾来此就职，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和移民问题的研究。



目前，东亚研究中心从属于科隆大学哲学系。研究所含中国学和日本学两个平行学科，前者为重点。东亚研究所图书馆藏有中文研究书籍近17000册（含期刊260期），并在不断增加。在中国学方面，该所设立了三个研究方向以及汉语教学组，分别为：

1.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该方向研究运用法律文化的概念，通过比较的视角来应对中国法律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它的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法、法律文化、中国的法律体制（如司法改革、维权诉讼）、行政法（如政策、法规和移民管制）和国际公法等。现东亚研究所所长伯阳教授（Prof. Dr. Björn Ahl）主持该方向。伯阳教授亦担任欧洲中国法学研究会会长，《中欧法律杂志》主编。

2. 中国文化研究。此类研究的侧重点在文化理论、媒体和哲学方法论等。此研究方向由旷斯凡教授（Prof. Stefan Kramer）领导。他的主要著作有《文化网络》、《全球化、文化身份和媒体展示》等。

3. 近现代中国研究。该方向由文浩教授（Prof. Dr. Felix Wemheuer）主持，文浩教授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留学，并在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2014年开始任职于



该所。他的专长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研究，主要论著有《马克思和全球南方》、《毛泽东时代中国和苏联的大饥荒》、《毛泽东》和《“石面儿”：中国河南省关于大跃进的乡村和官方记忆》等。作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在国际学术界上最有影响的报纸、杂志发表了不少关于毛

泽东时代的文章，并组织召开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目前他受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邀请撰写《毛时代中国的社会史》，并申请了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课题，重点关注地方文革的研究。

4. 汉语教学团队，由黄伟平教授（Prof. Dr. Huang Weiping）带领。黄伟平教授本人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现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和汉语国际教育。

东亚研究中心设有本科、硕士和博士三种学位，申请本科和硕士首先需要满足大学申请的基本要求；其次，语言方面要求掌握德语，英语需达到CEF（欧标）B2水平。硕士申请需要有相关专业背景。目前东亚研究中心中国学研究有教职人员18人，其中教授4人。本科、硕士和博士约计350名。课程为交叉学科设置，设有经济、法学、文化和社会研究方向的课程。■

【读者来信】

1. 皮皮侠答乔晞华

我本来不想再发声，看了乔先生的来信，不禁侠气大发，不吐不快。乔认为：“通过会员制可以促使有兴趣者加入义工的队伍。但是凡事都有利有弊，这样一来会把本来有点兴趣，可又不愿出力或没法出力的人挤出圈外。目前的情况，写书的人比看书的人多。人家有兴趣能来读你的文章就已经不错了。贵刊可以广招义工，通过自身的努力解决困难。”乔的意思是，这年头，有人理你就应该知足，你还要给人家设门坎，这不是自找倒霉吗？

乔先生的谦逊谦虚自贬自悲让俺的鼻子酸了好几酸。但是在感动的热泪没有盈眶之前，俺发现，他似乎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你的文章人家不爱读，俺爹俺妈俺父执俺兄姐俺同学发在《记忆》上的文章没准人家就爱读。再说，俺爹早就教育俺说，《记忆》就是当代的“铁函心史”，互联网就是苏州的那口古井。它既不想赚钱又不想赚名，走的是姜太公的路线，读的人多少又有啥子关系？

据俺理解“目前的情况，写书的人比看书的人多”的说法，是一种修辞，用极言看书人之少，来证明会员制之不可行。乔先生的巧用夸张，让俺想起陆机《文赋》中的“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乔先生说这话未免有些率尔，有些邈然吧？俺在美国呆过五年半，在中国呆了三十年半。无论中美，看书的都比写书的多。俺不是想跟乔先生掰扯看的多还是写的多，俺是想说，乔先生的夸张用错了地方——《记忆》是小小众刊物。钱钟书有言：“学问大抵是荒江野村，二三素心之人围炉闲话，互相切磋琢磨之事。”

十三年前，俺在大学学习科学发展观，知道无论什么事只要你想科学发展，就得力戒“屁股指挥脑袋”。（俺爹不用指挥，用“决定”）。“贵刊可以广招义工，通过自身的努力解决困难”这类表述，八成就是屁股指挥脑袋的结果——乔先生站在大洋彼岸说话，不怕找本人喝茶，不怕找家属谈话，不怕扣退休金，不怕政治问题经济处理。天下有“生命中不

可承受之重”，看来还有“世道间不可以承受之轻”。藐余小子怯怯地问一句：如果《记忆》“通过自身的努力解决困难”而“广招义工”的话，阁下肯报名否？有司不关注否？

乔先生是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想必熟知美国的大学是怎么订阅刊物的，请问，有哪家学术刊物是免费赠送的？有哪所大学出了书白给你？中国现在有钱了，欧美台港的学者惊呼，你们的教授比我们阔多了！可是阔起来的学者们，用国家的钱编了书也没有免费赠送的。《记忆》是公益，还是慈善？■

2.（德）魏大卫谈会员制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知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你们继承了贵国好客的传统，喜欢摆阔，显得你们是文明古国。你们又发扬了祖先用儒学迪化四夷的精神，还把毛主席的输出革命的红色教导，改头换面，装上了互联网国际快车，不输出“游击战”，“持久战”，“三个世界”了，而改成了输出“记忆”。据我所知，好多大学的东亚系师生都把你们的刊物当成必读书，他们的东亚图书馆还要把你们的刊物打印下来，装订成册，摆在书架上；还有不少学者教授把他们在记忆上发的文章，作为学术成果，写到他们的学术简历里——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搞会员制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难道就有免费的刊物吗？■

3. 蔡鸣乔纠错

读161期岳瑞民文，有一点请告知作者予以纠正：赵亮坚先生及其夫人的自杀事件，不是发生在1966年运动之初，而是在1968年4月8日，革委会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这个时间我是作了认真调查才落实的，丛立新老师也作了系列调查，在她的回忆文章中也有详细记录。赵亮坚运动之初也没有进“黑帮劳改队”，我有时想，如果运动之初他进了那个“劳改队”并且熬过来了的话，也许清队中就不至于会走上那条绝路？■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续霜红

本期校审：立新 尚在田 蒋健

本期版式：梁幼志